

中国（含西藏、新疆、香港和澳门） 201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香港、澳门和西藏的报告附加在本报告的末尾。鉴于新疆地区践踏宗教自由的广泛与严重程度，本报告中包含了该地区单独的相关报告。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活动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而且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据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报道，政府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在政府认为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威胁到国家或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时，继续对其加以限制。只有列入五个被国家批准的“爱国教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一的宗教团体才可以在政府登记，正式获准举行宗教仪式。继续有报告说，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由于从事与他们宗教信仰和崇拜有关的活动在拘押中死亡或因此而受到政府的酷刑、身体虐待、逮捕、拘留、判刑或骚扰。

据多个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估计，2017 年 4 月以来政府在新疆拘押了至少 80 万，可能超过 200 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穆斯林信众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中国公民，将他们关押在专门建造的或改建的拘押设施中，因其宗教和民族身份而对他们实行强制失踪、酷刑、身体虐待以及未经审判的长期拘押。有一些关于被羁押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局保持着广泛而且粗暴的安保与监视，尤其是在新疆，一部分原因是获取关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活动的信息。当局继续以防范“三股势力”为名，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来制定和实施对新疆的穆斯林宗教习俗的限制。新疆当局因祈祷而惩罚中小学生、大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禁止年轻人参与宗教活动，包括在斋月期间封斋。政府争取从外国强行遣返维吾尔穆斯林人士，并拘禁了一些返回的人。

宗教团体报告了在羁押中或被拘留不久之后死亡、失踪以及逮捕的情况，并称当局对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成员施以酷刑。全能神教会报告称，当局对数百名该教会成员“实施酷刑或强制洗脑”。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包括佛教僧人在内的西藏佛教徒自焚人数的信息，但据报该年度有 4 起自焚事件。政府于 2 月开始推行修订后的管理宗教团体及其成员活动的规定。宗教领袖和团体表示，这些规定加大了对从事宗教活动能力的限制，包括一条新规定要求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要经过批准，禁止“受外

国势力的支配”。基督教教会领袖称，甚至在新条例生效之前政府就加强了监督，造成许多教会停止正常活动。当局继续逮捕基督徒并对其活动施以更多的限制，包括要求基督教会安装监控摄像头以便警察每日监控，还迫使家庭教会成员和其它基督徒签署文件，放弃其宗教信仰以及所属的教会。关闭教堂的行动在这一年继续进行，当局拆除教堂的十字架和其它基督教标记，这类活动在河南省尤为突出。罗马教廷于9月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将解决长达十年之久的关于主教任命权的争议。

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报告，在就业、住房和经商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与汉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

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大使以及其它使领馆代表一再公开表示对践踏宗教自由问题的关切。7月26日，美国副总统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迫害从范围到规模都有所增加……佛教徒、穆斯林人士以及基督徒，还有其它的宗教少数群体都经常受到攻击。”都月21日，美国国务卿说：“成千上万的，甚至可能是上百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忍受严酷的政治洗脑以及其他可怕的迫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被毁灭。我们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对基督徒的新一轮的严厉镇压，其中包括关闭教会、烧毁《圣经》，以及命令信徒签署文件放弃自己的信仰等令人发指的行动。”及月24日至26日，由美国政府主办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发布的声明称：“包括维吾尔、回及哈萨克族穆斯林人士、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新教教徒以及法轮功在内的中国宗教少数群体因其信仰而面临严重的压迫和歧视。这些群体一直报告说，当局因宗教信仰及和平敬拜活动而对已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团体成员实施酷刑、身体虐待、任意逮捕、拘留、判刑或骚扰。当局还限制旅行，对很多宗教团体在选择、培养和尊崇宗教领袖等方面进行干扰……”大使和其他使领馆代表会见了中国官员、已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团体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士，以强化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支持。

自1999年以来，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中国因长期从事或容忍严重践踏宗教自由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特别关注国家”。11月28日，美国国务卿再次将中国认定为“特别关注国家”，并据此确定了如下制裁：根据1990年和1991年《外交关系授权法》（美国公法101-246）第402(c)(5)款，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监测仪器及设备。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总人口为 14 亿人（2018 年 7 月的估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SCIO）4 月发布的关于宗教政策及其活动的报告显示，中国有两亿以上宗教信徒。然而，许多专家认为官方数字低估了宗教信徒总人数。美国政府 2010 年估计，中国的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18.2%，基督教徒占 5.1%，穆斯林占 1.8%，民间宗教信徒占 21.9%。据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2017 年 2 月的估算，中国有 3.5 亿多宗教信徒，包括 1.85-2.5 亿中国佛教徒、6000-8000 万基督教徒、2100-2300 万穆斯林，700-2000 万法轮功修炼者、1200 万天主教徒、600-800 万藏传佛教徒和数亿有各种民间信仰的人。根据 2017 年犹太虚拟图书馆的数据，中国的犹太人口为 2700 人。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报告认为基督教徒为 3800 万。根据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网站 2017 年 3 月的信息，其中有 2000 万基督教徒隶属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是国家认可的一个管理组织，用来管理所有官方承认的基督教教会。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2014 年的统计，有 570 多万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爱国会（CCPA）登记的场所敬拜，天主教爱国会是国家认可的所有的官方承认的天主教教会所隶属的组织。国务院新闻办的报告称有 600 万天主教徒，但非政府的估算认为有 1000-1200 万天主教徒，其中大约有半数是在非天主教爱国会附属的教会中敬拜。很难估算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准确数字，因为许多信徒只在家中或未经国家认可的教会中进行敬拜活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告称，有 10 个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在 2000 万以上。其它消息来源显示，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最大的两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是回族和维吾尔族，其中回族人大多集中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以及云南省。国家宗教事务局估计回族人口为 1060 万。

在佛教教派方面没有可靠的政府数据，但根据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说法，佛教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信仰大乘佛教的。

在 1999 年政府禁止法轮功之前，政府估计有 7000 万法轮功成员。法轮功消息来源估计仍然有数千万人私下里继续修炼法轮功，自由之家估计有 700-2000 万法轮功成员。

一些少数民族保留了传统宗教，比如云南省的纳西族人中的东巴教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人中的布洛陀神信仰。媒体报道说，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汉族人口中越来越受欢迎。

关于各地区宗教信徒的数字，甚至是国家认可的合法宗教信徒的数字都不甚清楚，当局故意使其不透明。地方政府不发布这些统计数字，就连官方的宗教团体都没有精确的数字。皮尤研究中心和其它观察人士说，很多宗教团体往往都被少报了。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现状

法律框架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活动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宪法并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宪法说宗教不得用来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的健康或者干涉教育制度。宪法规定了拥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并规定国家机关、公共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那些“信仰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法律不允许以宪法赋予的保护宗教自由为由对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政府官员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刑法允许国家判处他们最长两年徒刑。

中共党员和武装部队军人必须是无神论者，禁止从事宗教活动。属于宗教组织的党员和军人一旦被发现会被开除，不过这些规定没有统一执行。绝大多数政府领导官员是中共党员，而且党员身份被普遍认为是公务员职业生涯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些对宗教信仰和活动的限制也适用于退休的中共干部和党员。

法律取缔了一些宗教或精神组织。刑法将被取缔的组织列为“邪教组织”，规定可对其成员进行刑事起诉，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还没有颁布此类刑事定性的标准或者对这种定性提出申诉的程序。一项国家安全法律明确禁止“邪教组织”。中共保持着一个由党管理的法律体系以外的安全机构，用于消除法轮功和其它类似的组织。政府继续取缔法轮功、观音法宗教团体（观音法门或观音之道）、中功（一种气功修炼法）。政府还将一些基督教团体视为“邪教”，包括呼喊派、全能神教会（也被称为东方闪电）、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三班仆人、门徒协会、主神教、被立王教会、世界和平与统一家庭联合会（统一教）、爱之家和南华教会。

《反恐怖主义法》将“宗教极端主义”视为“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或者歧视、鼓吹暴力”的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法规规定宗教团体要向政府登记。只有属于国家批准的五个“爱国宗教协会”之一的宗教团体才获准在政府登记，合法举行敬拜活动。这五个团体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下运作。其它宗教团体，例如不隶属于官方爱国教会的基督教团体或者表示效忠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不得登记为合法实体。政府没有国家批准的犹太教“爱国宗教协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没有为独立于五个官方爱国宗教协会之外的宗教组织获得合法地位提供机制。

3月，作为中央政府改组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原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合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UFWD），将宗教管理的责任直接归属共产党。国家宗教事务局虽然归属统战部，但仍然以同一名称开展工作。在此国家级行政变化之后的春季和秋季，省级和地方层面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

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须向五个国家批准的宗教协会登记，而这五个宗教协会均由国家宗教事务局通过其省级和地方办公室进行管理。于2017年公布、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规定，登记过的宗教团体可以拥有资产、出版经批准的材料、培训员工并募集捐款。根据条例，宗教团体必须提交有关信息，包括其团体的历史背景、成员、学说、主要出版物、最低经费要求以及政府挂靠部门；而政府挂靠部门必须是五个“爱国宗教协会”之一。据宗教事务局统计，截至2016年4月，全国共有36万以上的神职人员、14万个敬拜场所以及5500个注册的宗教团体。

国务院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修订强化了对未登记宗教团体的现有要求，规定未登记的团体要归属五个国家认可的宗教协会之一，以便合法开展宗教活动。参与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的人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条例规定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动或非法财产都会被没收，并处以违法收入或财产价值一倍至三倍的处罚。修订后的条例还称，如果无法认定非法收入或财产，即处以人民币5万元（\$7300）以下的罚款。这些规定为当局提供了依据，通过没收非法收入和财产以及处以人民币2万至20万元（\$2900至\$29100美元）罚款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向未登记的宗教团体出租场地的业主。修订后的条例还对宗教团体成员提出新的规定，出国旅行要获得准许，并禁止“受外部势力的支配”。

修订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包括要求宗教学校进行登记的新规定，只允许国家认可的五个宗教协会或其下属团体开办宗教学校。条例特别规定包括神职人员宿舍在内的所有的宗教场地都不得转让、抵押或用作投资。修订后的条例对宗教团体开展商务或投资作出了新的限制，规定宗教团体、学校以及场所的财产和收入都不得分配，只能用于符合其目的的活动以及慈善事业；任何捐款建设宗教场所的人都不得拥有和使用该场地。修订后的条例还对国外对宗教团体的捐赠作出限制，指出任何此类捐赠只能用于当局认为适合该团体和场地的活动。条例禁止接受外国团体或个人有附加条件的捐赠，规定任何超过人民币 10 万(\$14500)元的捐款都必须提交地方政府审查批准。宗教团体、宗教学校以及宗教活动场所都不得接受有附加条件的外国捐款。如果当局发现某团体接受非法捐款，法规给予当局权利，可没收捐款并对接受捐款的团体处以价值为非法捐款 1 倍至 3 倍的罚款；如果无法认定数额，则罚款人民币 5 万元（\$7300）。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新修订的条例扩展了对支持“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应采取的步骤，但没有提供对“极端主义”的定义。这些步骤包括了处罚建议，例如暂停团体活动以及取消神职人员的资格。修订的条例还首次包含了一个对宗教团体的网上活动施加限制的新条款，规定由省宗教事务局批准这种活动。修订的条例还用国家出版局的规定来限制宗教材料的出版。

各省与宗教有关的规定不尽相同，该年度中很多省都按照 2 月实施的条例来更新其规定。除了五种国家承认的宗教，地方政府还有权允许一些未经登记的宗教社区从事活动。比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允许东正教参与一些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与道教同源的民间神妈祖的崇拜被中央政府定义为“文化遗产”，而非宗教活动。

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其网页上发布一项政策称，家人和朋友有权在家中举行崇拜活动，包括祷告和查阅《圣经》，而无需向政府登记。

根据法律规定，犯人在监禁期间有权信仰宗教和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按照 2 月 1 日实施的新条例，不准在公共场所传教或者在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集体宗教活动。具体做法是，违规人员会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

宗教和社会法规允许官方“爱国宗教协会”从事活动，例如建立崇拜场所、培训宗教领袖、出版文字材料以及为地方社区提供社会服务。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民政部为执行这些法规提供政策指导和监督。

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一项刑法修正和司法解释将强迫他人穿戴“极端主义”服饰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修正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哪些服装或标志是“极端主义”的作出定义。

国家印刷法规限制含有宗教内容的文献出版和发行。未经许可发表的宗教文字材料，包括《圣经》和《古兰经》，可以被没收，未经授权的出版社可以被查封。

政府对国家批准的崇拜场所和宗教学校的建设提供一些补贴。

要建设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在做计划时以及开始在该处举行活动之前都必须得到相关地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在批准过程中宗教团体必须提交数十个文件进行登记，其中包括详细的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计划、详尽的财务记录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未经正式登记的宗教社团可能无法合法拥有固定的设施或崇拜场所。因此，他们每一次要租用酒店或公寓作为崇拜场所时都要分别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无论是正式登记还是为崇拜活动做单独申请，凡是未经预先批准而使用一个场所来从事崇拜活动都会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可能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按照规定，如果宗教建筑因城市规划或重点项目建设而将被拆除或拆迁，负责拆除的一方必须同地方宗教事务局（受到国家宗教事务局管理）以及使用该建筑的宗教团体磋商。如果所有各方都同意拆除，负责拆除的一方必须同意重建该建筑或提供等同于市场评估价的补偿。

2 月起实施的修订后的宗教管理条例以及国家认可的宗教协会执行的政策都禁止 18 岁以下的儿童参与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教育。例如，一项规定声称，任何人都不得用宗教来妨碍国家教育体制，以及除了宗教学校之外，任何学校都不得举行宗教活动。在县级层面上，包括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新疆等地方宗教事务局都发信告诉家长不得带 18 岁以下的孩子去参加宗教活动或接受宗教教育。

法律规定学校进行无神论的教学。中共向各大学发布了一项指示，指导如何防止外国人在大学生中间传教。

法律规定，求职者在应聘时不得因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受到歧视。

生育限制政策仍然在执行，要求所有已婚夫妇生育的孩子不得超过两个，少数民族或者宗教少数群体都不例外。生两个以上的孩子的妇女会被罚款，金额为当地人均收入的一到十倍。

中国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缔约国。对于澳门，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秘书长，澳门居民有权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限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有限制，也不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于香港，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为

有多个关于当局因宗教信仰或者归属将一些人致死、强迫失踪以及在监狱中采集器官的报道。

据全能神教会网站 kingdomsalvation.org 称，一名教会成员于3月被贵州当局以未经说明的指控逮捕之后不久即在羁押中死亡。当局称该无名人士上吊自杀，但不准其家人见到她的遗体。据称官员告诉她的家人，政府不准她信仰基督教。当她的家人对政府认定其死亡原因为自杀提出质疑的时候，当局以失业和孩子失去上大学机会来恐吓他们。

据法轮功的明慧网报道，1月16日警察将正在练功的叶国华和另外5名法轮功成员拘押并审讯。第二天早上警察释放了5名成员，将叶带到了建瓯拘留所，其家人认为他因修炼法轮功而在那里遭到酷刑。9月8日，当局称叶突发急症，被送入医院。当局允许其家人短暂探视，家人报告说叶陷入昏迷，其身体肿胀。叶于三天后死亡。当地的一名法轮功成员打电话询问叶的情况，接电话的人说：“他死了，没办法。你打听这个就是找麻烦。”

全能神教会报告说，4月中共警察秘密逮捕一名教会成员25天，并施以酷刑。该成员被送往医院，头骨严重受伤，数月后死亡。全能神教会还报告说，6月27日，两名教会成员被逮捕，其中一位于7月2日在朝阳市拘留中心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报告说，7月4日，当局逮捕并羁押了河北省的马桂兰，原因是她向人们谈到法轮功。9月17日，当局称马突然发病被送入医院，数小时后死亡。根据该报道，数名官员到医院，摘除了马的一些器官进行检验，但那些器官下落不明。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当局对包括法轮功、维吾尔人、藏传佛教徒和基督教“地下教会”成员等良心犯实施强制器官摘除。过去的囚犯指称在羁押期间当局对他们做血液检测及非同寻常的体检，输入数据库，以实现按需器官移植。12月10日，由非政府组织“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建立的独立法庭发布了一个临时判决，称该法庭“一致而且毫无合理疑问地确认，在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涉及了相当数量的受害者”。

8月，定期发布有关全能神教会情况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捍卫人权和宗教自由协会”（ADHRRF）报告说，4月到8月之间，四川省重庆市当局拘押了109个教会成员。其中有40人直至年底仍然下落不明。

高智晟仍然下落不明，尽管媒体报道说据信他还在国保警察的羁押中。高是一名人权律师，曾经为基督教团体、法轮功学成员和其它团体的成员辩护，于2017年9月被警方拘押。

有报告说警方对被羁押人员实施酷刑，包括剥夺食物、水和睡眠。

全能神教会报告称，该年度当局对525名成员施以“酷刑或强迫思想教育”。该教会还报告称其成员在羁押设施中遭到“酷刑和虐待”之后流产。

《环球邮报》9月报道，一名身为法轮功成员的加拿大公民在被北京当局审前拘押18个月期间遭到酷刑。据称在羁押期间当局先是剥夺她的食物和水，后来又将她推倒在地并施用胡椒喷剂。官方于2017年2月逮捕了她，罪名是“组织并使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被捕后，她丈夫将她所有的财产和公司股份都转到了他自己名下。据她说，是她丈夫向当局检举了她。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据当事人的女儿称，一个法院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于9月判决河北省法轮功成员陈慧霞三年半徒刑。大赦国际组织称羁押中心的官员折磨陈，将她绑在铁椅子上使她无法动弹。陈于2016年被拘押后与家庭和律师的联系有限。

据明慧网报道，监狱当局对被羁押的法轮功成员施加各种生理和心理压力，例如睡眠剥夺，目的是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

6月，在政府取缔之前贵州省最大的未经登记的活石教会牧师仰华（又名李国志）结束了两年半的刑期，其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据仰华称，监狱官员在他被判刑前和判刑后都折磨过他，试图让他对被控的罪名坦白交代。由于这个原因，加上监狱中医疗条件差，仰华患上血管炎，导致双腿近乎瘫痪，并患上了糖尿病。他的律师说，在仰华出狱后当局仍然监视着他。

警方逮捕或羁押未向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登记，成为其一部分的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有多个报告称，在实施逮捕和羁押期间，警方使用暴力和殴打。据称当局使用模糊不清或莫须有的指控，有时与宗教活动有关，将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定罪或判处多年徒刑。有些先前被拘留的人得到释放。

截至年底，由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管理的政治犯数据库

（PPDB）中计有如下数量的被监禁的宗教人士：310名基督教徒，205名全能上帝教会成员，136名穆斯林人士，22名佛教徒，以及9名天主教徒；而2017年底的数据是：308名基督教徒，277名全能上帝教会成员，107名穆斯林人士，30名佛教徒，以及9名天主教徒。据对话基金会称，这些数字来源于其政治犯数据库的分类系统，并非被监禁宗教人士的总数。被监禁的穆斯林人数并未包含505名维吾尔囚徒和234名哈萨克囚徒，这些人被对话基金会归类为“少数民族囚徒”。按照对话基金会的说法，这些数字并未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穆斯林纳入其中。截至年底，政治犯数据库列出了3486名被监禁的法轮功成员，而2017年底的数字则为3516名。对话基金会将被监禁的宗教人士定义为“因有未经官方认可的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的人士”。

法轮功报告说，该年度当局以拒绝放弃法轮功为由逮捕或骚扰了大约9000名公民。根据明慧网消息，当局逮捕了4848名法轮功成员，并骚扰了另外4127人。截至年底，被逮捕的人中有2414人仍被羁押。

据《大纪元时报》报告，上半年四川省安全官员拘押了省内78名法轮功成员。

附属法轮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报道，在“敏感”时期，对法轮功成员的羁押继续上升。当局要求街道委员会向官员举报法轮功成员。

全能上帝教会报告称，该年度当局逮捕了 1 万 1111 名教会成员，其中 2392 人仍在羁押中。

12 月 31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告说，100 多名防暴警察和人民武装警察在云南的巍山县闯进三座清真寺，并强行驱赶回族穆斯林，称其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当局打伤了数名抗拒驱赶的人。视频显示警察冲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推搡、拖拉并殴打他们。

12 月 24 日，在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两名警察对一名抗议拆除三自（TSPM）教堂的基督教妇女拳打脚踢。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 月 5 日，河南省南阳市着制服的人员闯进至少四座基督教教堂，控制质疑搜查行动的路人。

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基督教关注”组织称，11 月 21 日，100 多名着制服的政府人员闯进江西省吉安市的北门天主教堂，打伤了四名保护教堂的老年天主教徒。

《纽约时报》12 月 9 日报道，四川省当局闯进成都市拥有最多成员的未经登记的教会，秋雨圣约教会，拘押了 100 多名领袖、神学院学员和教会会众。这是自 5 月以来官方第三次因没有适当的登记而临检该教会。“对华援助协会”报告称当局 5 月逮捕了 200 名教会成员，6 月又逮捕了 17 人。一名被羁押人员公开说，警察在审讯他时殴打了他大约 30 下。据教会成员说，警察打了另外一名成员的脸，尽管他并未拒捕。5 月，当局以“寻衅滋事”的指控逮捕了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控制宗教的主理牧师王怡。12 月，王和他的妻子蒋蓉都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可能会导致无期徒刑。截至年底，许多被拘押的人依旧下落不明，情况不清，其中包括王及其妻子，他们被关押在不明地点。

王怡牧师预感到自己会被逮捕，写了题为《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的信，于 12 月 9 日被拘留之后由秋雨圣约教会发布出来。他写道：“我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剥夺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恶，充满厌恶和痛恨。……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

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

据关于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上杂志《寒冬》报道，全国各地的牧师于8月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支持宗教自由，谴责中共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截至年底，有600多位牧师和教会长老在声明上签名。据报道，每个地区的宗教事务局都严密监视所有签署声明的人员，禁止他们前往成都支持秋雨圣约教会。秋雨圣约教会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当局已经对半数以上的签名者问话并施加压力。据说当局还搜查并关闭了有在联合声明上签名的牧师的一些教堂。

3月，云南当局以“组织他人非法越境”的罪名判处基督教牧师约翰·曹三强7年监禁；曹是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也是一名基督教领袖。

自由亚洲电台一月报道说，辩护律师肖云阳称，云南省云县法院判处6名基督徒最高13年徒刑，罪名是参与了被政府政府认定为邪教的“三班仆人派”。据报道，云南当局告诉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们，他们的执业证书将被审查。律师李贵生说，法院吊销了云南省凤庆县同类案件中为基督徒辩护的律师的执业证书。4月，云南省大理市一个法院判处涂焱两年徒刑，罪名是参加“三班仆人派”的活动。2016年，作为涉及云南省100多名基督徒的一个案件的一部分，涂被逮捕并羁押在拘留中心20多个月才被判刑。当局对涂最初的指控是“组织并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执法”。

4月政府判决活石教会牧师仰华的同仁牧师苏天福长达一年的缓刑及6个月的监视居住，罪名是“非法拥有国家机密”。当局还以“非法”募捐为名对苏和仰罚款705万3710.68元人民币（103万美元）。苏表示教会成员是自愿捐款以资助教会活动，但政府驳回了苏的上诉。

11月16日，《南十字座》（Crux）报道，受梵蒂冈任命但却不被政府当局认可的温州天主教主教彼得·邵祝敏再次被拘押。文章提到，邵“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被审讯多日”，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当局否认知道他的下落。据新闻机构天亚社（UCA）的消息，当局在拘押邵14天之后于11月23日释放了他。消息来源称，安全人员在2017年的圣周（4月9日到15日）将邵拘押了5天。当局随后又于5月将邵拘押，直至2018年1月3日将

其释放。自 2016 年 9 月以来，当局已多次拘押邵，据说是要防止他在文森特·朱维方主教去世之后控制温州教区。

天亚社还报道说，2017 年 12 月在浙江省温州市被青田宗教事务局的人员带走的天主教神父卢丹华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被释放。报道称，有消息来源说当局拘押卢的原因是他们想用天主教爱国会的一名神父来取代他在青田教会的位置。

媒体报道说，警方与 3 月 26 日拘押了由梵蒂冈任命为福建省闽东地区主教的文森特·郭希锦，据说是因为他拒绝与被政府认可却不为梵蒂冈接受的主教文森左·詹思禄联合主持复活节弥撒。警方于次日释放了他。作为让步，当局允许郭主持弥撒，条件是他必须保持“低调”，并同意不戴他的主教标记。

6 月 3 日，据“对华援助协会”称，警方在广东省的鹤山市逮捕了浸信会传教士梁子亮和他的妻子李银秀，原因是他们在当地一个公园散发基督教宣传册并打出抗议堕胎的标语。当局将夫妇二人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数日。

6 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判处法轮功成员马振宇 3 年徒刑，并罚款 3 万元人民币（4400 美元），罪名是向中国上层领袖写信，为法轮功辩护。8 月，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11 月马的律师请求与他见面，但当局拒绝了他的请求。截至年底，马仍在江苏省的苏州监狱服刑。马以前也曾经遭到监禁，他于 2017 年 9 月被捕，据说当局告诉他“这一次我们要让你死在监狱里”。

据《福音先驱报》报道，3 月 15 日，警方逮捕了辽宁妇女周金霞，她从大连前往北京，试图向习近平主席传福音。周在原皇家园林中南海前打出标语，上面写着“神爱世人，呼召习近平”。当局立刻将她送回大连，当局在那里对她提出刑事起诉。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7 月，四川当局发现两名西藏商人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而将他们拘捕。

政府不承认那些不从属于“爱国宗教协会”的宗教团体，其中包括未经登记的基督教（又被称作“家庭教会”）、天主教、穆斯林以及其他团体，并继续关闭或阻碍他们的活动。据报道，有时候是因为该团体或活动未经登记，有时候是因为礼拜场所据称缺乏必要的许可而被关闭。

一些地方政府继续限制未登记的基督教教会网络和跨教会附属关系的发展。有些官员据说仍然否认存在未经登记的教会。尽管宗教事务局说过家人和朋友有权在家里一同敬拜，包括祷告和查经，无需向政府登记，当局仍然定期骚扰并拘押这样做的小团体。

在执行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时，当局要求解散未登记的宗教团体，致使他们的会众唯有参加由国家认可的宗教领袖主持的活动，而不允许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宗教团体来改变其合法地位。

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于2月1日生效后，河南省19个镇的官员挨家挨户地敦促基督徒加入隶属于政府主持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的教会，而不去加入未经登记的教会。据报道，因为担心公安人员，很多基督徒只得秘密地在他们的家中聚会。

消息来源称，甚至在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于2月1日生效之前，辽宁省各地的公安局就开始加大力度，强行关闭了数十个未登记的“地下”教会并拘押了这些教会的牧师。据《寒冬》报道，从3月开始，辽宁省当局在诸如东港、丹东、鞍山和沈阳等城市里至少关闭了40个未登记的教会。

据美国之音9月报道，有大量报告显示，河南政府发动针对该省基督徒的运动，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从教会建筑中清除基督教标语。据《寒冬》称，在过去几年里河南省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基督教迫害”。

7月下旬，宗教事务官员闯进重庆爱阳家庭教会，并命令该教会停止所有的“非法”活动。他们引用新的条例告诉会众，他们是在一个未经登记的地点从事宗教活动，命令他们去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附属教会的宗教活动。当局警告会众，如果不服从就会逮捕他们。

2月4日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警方又关闭了一个家庭教会，并赶走了80多名会众，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报告称，9月7日江苏省徐州当局搜查了道恩教会，声称该教会未向政府登记。该报道说，当局关闭了该教会5个聚会点中的3个，向房东施加压力不准给教会延续租约。对华援助协会之前报告，当局对牧师和道

恩教会的另外一位神职人员罚款 1 万元人民币（1500 美元）并威胁没收教会的奉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 月 9 日，北京当局籍口未向当局登记、违规组织宗教活动而取缔了未登记的大型基督教的锡安教会；该教会由艾兹拉·金明日牧师主持。一位姓易的教会长老说，100 多名警察进入教堂，拘押了一些试图阻挡关闭教堂的教会成员。尽管尚未到期，教堂的房东取消了租约。

自由亚洲电台 2 月报道，深圳当局在一次火警和消防安全检查之后命令有 3000 名信众的蛇口国际教会关闭。同月，河南省的当局对禹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处以罚款，理由是违反建筑和安全规定，并称该建筑是违章建筑，因为教会未经许可建筑该场地。

消息来源称，辽宁地方当局指控地下教会领袖以虚假借口收取信众的金钱。对华援助协会报告称，8 月 20 日，当局到访了沈阳一个教堂，称其为“未经批准的会场”。官方认定教堂的奉献为违法，迫使教堂于 8 月 23 日关闭。12 月 31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遭到抗议之后，当局查封了云南巍山县的三个清真寺，以防止人们在等候年底拆除之前继续使用该场地。来自当地的消息来源称，当地的穆斯林人士提交了正确的文书登记这些清真寺，但没有获得成功，当地国家认可的中国穆斯林协会（IAC）批准关闭这些清真寺。

据《南华早报》报道，8 月份有数百名回族穆斯林人士聚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韦州大清真寺外抗议拆除。该清真寺最近才重新修建，是韦州这座有 600 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的清真寺的第二次重建。文章称，尽管政府在 2015 年似乎支持该清真寺的建设，政府官员却说该建筑并未获得必须的设计和施工许可。经过多日的交涉，当局和宗教领袖商定了一个替代计划：政府不拆除清真寺，而是对其更新，只有在各方都对改造计划满意的时候才开始施工。政府开始时要拆除 9 个圆顶中的 8 个，但当地社区反对这一想法。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河南当地的信众说，8 月份当局拆除或查封了 100 多个教堂和十字架。

据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消息，9 月 16 日，河南省郑州市当局通过威胁信众的家庭生计的方式强迫他们同意，随即拆除了杨寨真耶稣教堂。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告，9月9日，大约有100名宗教事务局和公安局人员试图闯入河南省郑州市的大理基督教堂，但被400多名教会信众阻止。官员离开前留下了一份文书，声称该建筑不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部门没有批准当天的宣教人士演讲，这都违反了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教会信众因此不得不立即停止举行“非法”的宗教活动。

《寒冬》报道说，从10月28日到11月1日，当局关闭或查封了河南省新密市的35个佛教寺庙和祠庵。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1月14日星期日，政府人员关闭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未登记的教会，中断了由娄四平主持的敬拜活动。他们告诉在那里聚会的基督徒，该建筑未经登记，并将30多名信众带到派出所问话。当局随后要求该教会的房东取消租约。

据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消息，警方和地方官员1月爆破拆除了山西省临汾市拥有5万信众的金灯台教堂。国有的《环球时报》报道说，该拆除行动是反“非法建筑物”行动的一部分。这个教堂没有向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登记，并有报道称，因当地官员最初拒绝颁发建筑许可而产生争执。

《寒冬》报道说，陕西省统战部发布了一份文件，提出展开反对在秦岭中兴建佛教和道教场所的运动；统战部认为那些建筑违反了建筑和程序规定。7月，当局摧毁了西安市长安区太乙镇的龙华寺，称该寺庙未经许可。8月底，当局派100名武警和两部挖掘机摧毁了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玉佛寺。据《寒冬》报道，一些原来住在寺庙中的僧人无家可归，也不允许当地村民收留那些僧人。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政府官员于12月18日到19日摧毁了圣特丽莎修道院。居住在修道院的修女们在12月18日上午收到清场通知，到晚上11点当局便开始拆除该处。据报道，教会成员认为，当局摧毁修道院是为了给未向政府登记的教会会众施加压力。修道院拆除后，修女们暂时无家可归。

多个受到教皇任命的教会和主教仍然未能在天主教爱国会（CCPA）登记。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仍旧没有外交关系，梵蒂冈在中国没有代表。罗马教廷和中国外交部都于9月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将解决长达数十年

的有关主教任命权的争议。但双方都没有提供关于临时协议的细节。教皇方济各在 9 月底与媒体对话时提到，会就教皇即将任命的主教人选进行“对话”。截至年底，关于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对主教任命作决定的机制尚未有所解释。政府现行的有关选派主教和祝圣的规定要求主教候选人公开保证支持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在 9 月，梵蒂冈称，教皇将解除对 7 名未经教皇任命的主教逐出教会的决定。梵蒂冈随后任命其中的两人主持教区，并将其以前任命在那些教区担任主教的人（包括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改任辅理主教。

在 2 月的一次采访中，退休的香港教区大主教陈日君枢机谴责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会谈。陈表示担心梵蒂冈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易会给与当局过多的权力，会将中国的天主教徒关在“鸟笼”之中。

当局非正式地容许外国团体的成员举行私人宗教庆祝活动。国际教会受到严格审查，因为当局强迫他们要求检查护照和会员注册，以防止中国公民参加“外国人”的教会活动。

5 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草案。这些条例将更新 1991 年颁布的条例，适用于有 50 名及以上外籍人士参加的宗教活动。修正案草案规定了团体可以在哪些地方举办宗教活动，谁可以主持和参加这些活动，谁应负责向当局报告活动情况，以及必须提供参加人员的哪些信息。为了给自己的活动获得许可，团体需要提供三个没有外交豁免权的代表的姓名。外国团体必须同意有相应的由国家认可的宗教协会派一名中国宗教专业人士主持活动。禁止任何其他的中国公民参加这些外国团体的活动。截至年底，国家宗教事务局尚未宣布开始实施这些条例。

中国政府继续认为，那些政府认可和被“爱国宗教协会”管控的宗教活动才是“合法的”。政府认证的宗教人员只能在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

国家宗教事务局继续管理已登记宗教团体的统计数字。据 2017 年 9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有关宗教政策和情况的报告，现有 21 个被证实得到认可的基督教神学院，5 万 7000 名牧师，6 万个教堂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这个报告称，全国共有 91 个被宗教事务局批准的宗教学校，其中包括 9 个天主教学校。这个报告还称，国家级别的宗教学院有 6 所。民间社会团体报告说，政府关闭了上海和四川省成都市的附属于天主教爱国会的神学院。尽管

北京有两所天主教爱国会附属神学院，民间团体认为其中一个主要是用于天主教爱国会对国际到访人士做宣传之用。

国营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主教的话称，现有 61 名（天主教爱国会附属）天主教主教，其中 12 位年龄已经超过了 80 岁。梵蒂冈先前并未认可其中的 8 位主教，并且已绝罚了其中的三位。据报告天主教教会的网上报刊《南十字座》（Crux）9 月报道，尚有超过 37 位独立于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据报道，在一些地区，地方当局向未登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及其信众施压，让他们放弃罗马教廷发布的所有祝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报告估计，全国约有 3 万 5000 个清真寺，5 万 7000 个伊玛目，10 个伊斯兰经学院（由穆斯林协会主办的宗教修习所）。

据宗教团体报道，“爱国宗教协会”在学说、神学和宗教活动方面继续受到中共的干涉。官方的“爱国宗教协会”定期审查布道活动，有时要求教会领袖和宗教局官员一起参加教育会议。他们还密切监视，有时阻止宗教领袖与外国人自由见面。

作为实施中央政府有关宗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 9 月在贵州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了他们的说法，即过去 68 年来三自爱国会在帮助中国的基督教摆脱外国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在真正获得主权的同时加强了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情怀。宗教学者说，他们将此说法理解为限制基督徒与国际基督教团体互动的非正式指导意见。

8 月底，在河南省焦作市，中共官员强行占领了多个三自爱国会的教堂，并将它们改成党校、文化中心和活动场所。《寒冬》报道说，9 月份登州市至少有 20 个教堂、洛阳市至少有 138 个教堂被改造成满足政府需求的场所，其中包括一些政府批准的三自爱国会教堂。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东北地区的未登记的教会比全国其他地方少。尽管仍受到严格控制，据报道过去几年东北地区的宗教团体在布道和活动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消息来源显示，当局关闭了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省的一些主日学校。消息来源还称，直到 7 月之前，东北地区当局很少执行一项禁止教会为未满 18 岁未成年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定。直到最近，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主要影响未登记的教会。7 月，当局开始更严格地审查辽宁省的

已登记教会，包括向 18 岁以上的年轻人施加压力，不要去参加教堂的礼拜。据说有些教会停止提供给大学生的宗教服务。

有多个报告称政府官员、公司和教育当局强迫家庭教会成员和其它基督徒签署文书，放弃其基督教信仰和教会。

据《寒冬》报道，很多公司从 2 月开始要求工人签署“不信教责任书”。4 月到 8 月之间，北京当地的安全人员接触了将近 300 名锡安教会成员，迫使他们签署文书放弃他们的教会以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 月中旬中共进一步采取措施执行禁止包括教师、医务人员在内的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宗教活动的禁令。浙江、江西和河南省的基督徒称，当地当局要求在高中工作的教师签署一封信，承诺不信教。基督教信众称，对教师宗教信仰的镇压与对学生的压力同步进行；那些在必填表格中宣称有宗教信仰的学生都要被学校当局面谈。

基督教新闻网站《世界监察》（World Watch Monitor）4 月报道说，浙江省的两个高中强迫 300 多名基督徒孩子填表声明他们不依附于任何宗教。根据该报道，孩子们得到一份有关他们信仰的问卷，被迫写下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据报道，那些不服从的孩子们在学校被剥夺了应获得的机会，并面临得不到结业证书的威胁，而没有证书他们是无法上大学的。

对华援助协会 5 月报道，浙江省温州市的教育当局要求学生交待他们家人的宗教信仰。在识别了哪些家长是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信徒之后，当局对这些家长做家访，劝说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些当局借助家长的雇主来施压，以扣发奖金等方式强迫家长放弃宗教信仰。

据一些牧师和一个监督中国宗教的团体说，政府命令基督徒签署文书放弃他们的信仰。《纽约邮报》9 月报道说，对华援助协会的领导层公布了看上去有许多堆被焚烧的《圣经》的视频片段，还有一些表格声称签名人放弃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对华援助协会领导层称，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之后基督徒第一次因恐惧被开除学籍或失去福利待遇而不得不作出此类声明。

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道了一起全国性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中国政府限制了个人以其他方式表达或践行其宗教的能力。

3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发布了一项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5年计划。该计划倡导“将中国元素融入教会礼拜活动、赞美诗歌、神职人员服装以及教堂的建筑风格”，并提出要“重新翻译《圣经》或改写《圣经》注释。”政府提出要根据中共的政策增加《圣经》内容的计划使一些基督教团体猜测，这是政府开始强行禁止网上《圣经》销售的原因之一。

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中北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地的城市都有关于当局致力于用中国传统图像标志取代伊斯兰建筑与象征符号的报告。银川有多人报告称，有中国云图像的大红灯取代了有伊斯兰图案的灰色灯柱，两个扁平的中国玉盘式的圆环取代了两个新月形雕塑。地方政府禁止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制定计划要将现有的清真寺改造成中国庙宇的样子。

自由亚洲电台8月报道，国家认可的宗教协会提议实施一项措施，要求所有的敬拜场所都悬挂国旗。北京一个会议的代表表示，应当在国家节日和每个重要的宗教节日与庆典时悬挂国旗。这项措施还显示，如果不这样做，有关官员就会检查有关礼拜场所。

据报道当局向教会施加压力，要求在教堂各处悬挂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标语，在唱基督教赞美诗前先唱国歌，以及采取其他一些能够显示对中共忠诚高于对教会忠诚的行动

对华援助协会称，7月初，在江西省新余县有100多个教堂接到地方当局的警告，要求他们拆除十字架，代之以习近平主席的画像或国旗。据报道，政府人员捣毁了那些拒绝拆除十字架的教堂的十字架。

张良牧师9月报道称，河南省商丘市当局开始要求教会在十字架的两侧分别挂上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主席的照片。

据《寒冬》报道，11月1日，河南省洛宁县当局命令一个政府批准的三自爱国教会移除墙上展示的十诫中的一条。当局称习近平主席反对该戒条，即“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于是他们抹去了那条诫命。在此事件之前，媒体8月报道过，政府官员强行拆除了该教会的十字架。

2017年，宁夏政府发起了一项从街道标牌中去除阿拉伯文的运动，到了2018年2月，所有的清真饭店和肉铺的阿拉伯语标牌都被移除，代之以汉语文字和拼音。该文章称，宁夏同心县政府禁止党员（即使已经退休）到清真

寺做每日祈祷或去朝觐。当局还禁止政府公务员在工作时间戴小白帽。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当局以噪音污染为由禁止宣礼。政府官员命令礼品店将《古兰经》和伊斯兰书籍下架，还命令清真寺取消面向公众的阿拉伯语课。

《寒冬》报道说，当局告诉河南省新密市的佛教庙宇住持，他们必须拿掉标语并锁上门，因为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当局将展示的捐款人名单中那些向庙宇捐过钱的党员的名字覆盖掉，根据该报道，村民们说他们将涂抹捐款人名单的行动视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来临。

据媒体报道，至少有四个城市和一个省下令限制庆祝圣诞节，包括禁止使用圣诞装饰，禁止商店促销活动，禁止圣诞节主题活动以及公开表演。当局在接近 12 月 25 日的日子里增加了执法与巡逻以防非法的圣诞庆典活动。昆明的警方发布了通知，禁止使用圣诞装饰和在如宾馆、卡拉 OK 场所、互联网吧以及酒吧等人群拥挤的场所举办其它相关活动。通知说，“禁止悬挂圣诞袜、戴圣诞帽、摆放圣诞树等等。”有关官员向河南省周口市教会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将圣诞庆祝活动提交政府审查，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圣诞活动，并将费用限制在 2000 元人民币（\$290 美元）。上海一个大学的学校行政人员取消了学生会的圣诞节庆祝活动，青岛的行政官员就庆祝圣诞节对学生发出警告。

根据 8 月 2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的一个简短声明，国家新修订的民法典将不再保留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内容，这可能会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但是修订后的民法典要到 2020 年 3 月才能完成，而且目前尚未表明会作出什么样的改动，或对中国家庭是否会有其它的限制或条件。

据政府主办的《环球时报》12 月报道，甘肃省的市场监管局禁止对食品、餐馆、奶制品和面条做省级清真认证。文章援引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名官员的话称，一个区和 5 个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陕西、河南、云南省以及天津）也会对一些食品限制使用清真认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些省是根据中共统战部“打击泛清真倾向”的要求来限制这些标准的。

据当地消息来源称，与维吾尔人相比，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青海及云南的回族穆斯林人士在参与宗教活动方面仍然较少受到政府的干涉。回族穆斯林报告说，他们可以自由地按照家庭习俗礼拜，比如在斋月期间禁食、穿

戴、祈祷和朝拜等。但是他们报告说，他们在工作日得不到特别的时间安排做祈祷，伊斯兰节日期间也不会放假。

8月，湖北省政府发布了有关佛教和道教商业化的新规定，称任何宗教的所有活动都必须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严格禁止宗教图像标志出现在公共场所。

当局增强了在社交媒体对宗教团体的监控以及其他监控。据《寒冬》报告，河北和河南省的教会领袖已开始警告他们的教会会众，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受到监视，并提醒他们不要传播宗教内容。

寻求使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散布基督教材料的基督教团体报告称，政府加强了对这些材料的审查。

自由亚洲电台7月报道，青海省黄南（Malho）自治州当局收紧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在藏族村庄部署了大量的武装警察，以阻止庆祝7月6日达赖喇嘛生日的活动。当局告诫社交媒体聊天群的群主，要限制藏人分享秘密或内部信息，留意庆祝这位精神领袖生日的企图。

《华尔街日报》7月报道，中国穆斯林协会要求中国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的穆斯林人士佩戴定制的带有个人数据和GPS追踪器的智能卡。

9月，张良牧师报告称，中国政府对他在河南省商丘市的教会运作加强了控制。张说，政府安插了“信息员”，报告“反政府”活动以及被认为是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北京当局命令未登记的锡安教会在教堂内安装24个闭路监控摄像机。当教会领袖拒绝这一命令后，警察和安全人员骚扰并威胁教会成员，最终强迫驱逐了该教会。据《寒冬》报告，在甘肃省兰州市，国家安全局11月在一座正式登记过的基督教教堂中安装了监控设备，包括多个监控摄像头，连厕所里也有。

当局继续限制印刷和发行《圣经》及其它宗教文献，而且政府制定规则，对宗教团体在网上发布材料扩大了控制。

政府将分发《圣经》的范围限制在天主教爱国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机构中，例如教堂、教堂内的书店和神学院。个人不能直接从

出版社购买《圣经》。未登记的教会成员报告说，《圣经》的供应和分配不足，在农村地区尤为如此。属于三自爱国会的省级基督教出版社大约有 11 个。当局只允许国家级的三自爱国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合法出版《圣经》。据报道，尽管国内没有独立的基督教书店，与宗教无关的出版社也可以出版基督教书籍。与国家三自爱国会有关联的发行中心和书店大约有 20 个。此外，据说当局还允许有 2000 名以上成员的教会在其教会设施中出售书籍。大约有 700 个教会有这种书店。该年度中，当局继续限制每年可以出版的基督教书目的数量，书稿被严密审查。当局还限制一些书店出售基督教书籍的能力。

《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报道称，虽然只有政府批准的管理基督教教会的那些机构才能够正式出售《圣经》，有关当局往往会睁只眼闭只眼。文章还报道说，4 月里文化部检查人员多次登门告诉一些基督教书店，他们不能再销售“外国书籍”。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据一个淘宝卖家所言，从 4 月 2 日开始，网上销售平台淘宝、京东以及当当网都禁止销售没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的《圣经》以及相关宗教书籍。《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政府禁止网店销售《圣经》，在主要的网店搜索《圣经》的结果都一无所获。文章还报道说，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其主要的经书“不能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销售”的主要宗教。截至年底，一些网站至少销售一本双语（英文和中文）《圣经》和两本外国出版的英文《圣经》。但是在网上仍然买不到纯中文的《圣经》。

《寒冬》报道称，在辽宁省鞍山市警方对任何被发现有“非官方”版本《圣经》的教会罚款 40 万元人民币（\$58200 美元）。面对这些压力，地下教会称他们的聚会大大减少，而且分成了小组四处转移，在不同的地方礼拜。

政府继续允许一些外国教育机构提供中文版的宗教材料，供经过登记的和未经登记的宗教团体使用。

据美联社 9 月报道，政府发布了规范互联网上宗教活动的规则草案，该规则会严格限制什么话可以说，什么帖子可以发布，包括禁止批评官方的宗教政策以及不准向未成年人传教。规则草案会要求任何有意在互联网上教授宗教或提供类似服务的人以实名申请，由当局评估他们在道德上是否合宜、政治上是否可靠。他们还禁止网上直播宗教活动，包括祷告、传教以及燃香。

据《寒冬》报道，规范互联网上宗教活动的规则草案会强迫教会取得执照，从而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在网上发布的宗教信息。

政府继续限制宗教教育。

《南华早报》1月报道，在主要人口为回族穆斯林的甘肃省广河县，当地政府的教育官员禁止儿童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参加宗教教育活动。官员不允许孩子们参加宗教活动，节日期间不准进入宗教场所，并要求老师和学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宣传工作”。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首府临夏市官方也实施了类似的限制。

据报道自4月起当局对教会施压以禁止18岁以下的人参加教会活动或学习《圣经》。河南、山东和安徽各省政府的宗教事务局发布公开信，宣布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宗教场所或参加宗教教育活动。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个通知称，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保证未成年人不信教、不进入宗教场所、不参加宗教活动，不参加宗教培训班。其它地方也发布了同样的信息。据亚洲新闻通讯社4月报道，河南天主教爱国联合会和河南教会事务委员会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宗教团体遵从“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尤其是禁止宗教团体为未成年人举办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活动；这有效地阻止了未成年人参加教会。

8月，一个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打开大门-美国”报告说，在江西省上饶市有40多个教会悬挂横“非本地人禁止传教；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横幅。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0月25日，国家安全人员禁止100多名未被承认的基督教徒前往韩国参加一个由美国教会主持的宗教培训活动。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机场的警方对这些会议参加者发出禁止旅行的命令，声称这些人“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7月报道，藏族人口稠密的四川省札处卡（Dzachuka）地区当局强迫15岁及以下的佛教喇嘛离开寺庙，并将他们安置在政府开办的学校里。当局严格限制寺庙里在册僧尼的人数，并强迫留在寺庙的僧尼参加提倡忠于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的课程。

4月16日，大约有20名来自福建省厦门教育局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在没有正当手续的情况下闯进一个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由当地未登记的家庭

教会开办的。当局称该幼儿园非法经营。据报道当局企图没收宗教教材并关闭幼儿园，但教师和家长制止了他们。

6月20日，广西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柳宁向100多名伊斯兰神职人员及行政人员进行了两次讲话，传达共产党19大的精神，以及如何推行修订后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欲入读官方的神学院或其他官方宗教学习场所的个人必须获得相应的官方“爱国宗教协会”的支持。政府继续要求学生表现出“政治可靠性”，并将政治问题纳入宗教学校毕业考试的内容。登记的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都报告说缺少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对神学院招生的控制。

据报道，对那些被认为是“邪教”的宗教团体成员和其它一些人，政府在就业方面歧视，而且政府禁止公务员参加宗教活动。

2月，在贵阳的云南区人民法院在其司法助理招聘通知中具体申明，那些以前曾经参加过“非法宗教活动”或“邪教组织活动”的人不得申请该职位。

2月18日，曾经被监禁的江门家庭教会神职人员阮浩楠表示，在黑名单上的“邪教”成员几乎都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阮在全职为鹤山市一个家庭教会工作之前是一名厨师。他说当局警告阮接触的每一个雇主，结果没有人敢给他工作。鹤山警方于2017年6月12日逮捕了阮，罪名是利用和组织“异端邪教团体”破坏执法；警方于2017年7月允许其保释并限制行动。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当局要求阮在保释期间每三个月向公安局报告一次，旅行前需获得许可。

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中国东北地区与基督教有关的人员都面临职业晋升或在政府中找工作的困难。政府官员或国有机构的雇员经常要掩饰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免受到歧视。消息人士称，这是很多信众选择参加未登记的教会而不是官方教会的原因之一。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接到一封发给员工的信，要求发现、制止和报告违反宗教法的情况，包括家人、朋友和邻居。任何在医院组织或参加宗教活动的员工会被解雇。员工被禁止穿戴任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服饰。员工如果不遵守不信仰任何宗教或参与宗教活动的承诺就会被认为是

违纪。医院的信说，违反这一政策的人会受到“教育”。江西省新余市的医院也悬挂了反对宗教信仰的标语和通知。

当局对反“邪教”采取了另外的行动。3月17日，广州的花都区政法委员会在红山村为当地的学生举办了反邪教组织的活动。活动之后，很多学生宣誓远离“邪教”组织，并在反邪教签字墙上签名。

4月，福建省的漳浦县政府和漳州司法局重新设计了一个地方公园，以反邪教为主题，宣传中共19大和有关反邪教的法律，并提高人们对“邪教”影响的认识。

4月24日，中共佛山市政法委、广东财经大学三水校区（佛山），以及广东法治研究院三水校区联合发起反邪教运动，强调“邪教”对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2月24日，广东省反邪教协会张贴了一封由前广州法轮功成员张志明写的信，谴责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危害了他的工作，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

9月，江西省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发表文章，显示该省控制宗教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文章称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应当是“温和可亲”的，应当为人民团结做贡献。

《每日电讯报》11月29日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当局与新疆官员签署了一个“反恐合作协议”，以“向新疆学习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中共宁夏党委书记张云生到新疆去学习如何打击恐怖主义和管理宗教事务。据“人权观察”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说，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恐惧，担心新疆模式会扩大到全国，给宗教自由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政府的政策继续允许宗教团体从事慈善事业。法规明确禁止基于宗教信仰的团体在进行慈善活动的时候传教。当局要求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团体和其它慈善团体一样向政府登记。一旦登记成为正式的慈善机构，当局允许他们公开募捐，并获得税务优惠。政府不允许未登记的慈善团体公开募捐、雇用员工、开银行账户或拥有财产。根据几个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称，政府要求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机构获得当地政府宗教事务局共同支持的登记申请。当局通常要求这些团体附属于五个“爱国宗教协会”之一。

政府继续致力于限制达赖喇嘛的行动。达赖喇嘛 9 月访问瑞典之后，《环球时报》报道称，政府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国家允许达赖喇嘛到访的决定，还说，“……一些国家仍然充耳不闻，贸然挑战中国的底线。”

10 月，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缅甸当地的拉忽浸信教会称，自 9 月的第二个星期以来，中共支持的军事组织“佤邦联合军”在他们控制下的位于缅甸掸邦的领土上逮捕了 200 多名基督教牧师和传道者。至少有 100 人在看守强迫他们签署承诺书保证只在家里而不是去教堂祷告以后获释。这个报告说，很多观察人士相信，佤邦联合军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这些行动。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由于政府和个人都将宗教、文化和民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社会歧视事件很难被归咎于仅仅是由于宗教身份的原因。据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诸如藏传佛教和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与少数民族群体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制度化的歧视，这既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因为他们是有着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

尽管政府于 2017 年 9 月宣布将审查互联网上的一些反穆斯林言论，但社交媒体中这样的言论仍然广泛存在。

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反云南省沙甸回族穆斯林的言论依旧存在。有些人说，在沙甸吸毒和贩毒方面，沙甸的伊玛目与缅甸的罗辛亚穆斯林人相勾结。这些网络论坛上的批评声音还包括将沙甸伊玛目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称他们鼓励该城的回族穆斯林与罗辛亚人结婚，而且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

尽管劳动法规定在就业方面不得有基于宗教信仰的歧视，有些雇主还是公开歧视宗教信徒。有些基督教人士报告称，由于他们的宗教活动而被雇主终止了工作。一些法轮功成员也报告说，雇主因他们修炼法轮功而解雇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房东因宗教信仰而歧视一些意欲租房或现有的租户。法轮功成员报告说，很难找到愿意出租公寓给他们的房东。在政府 5 月和 12 月的镇压之后，四川省成都市秋雨圣约教会的会众报告说，由于他们与未登记教会的联系，地方当局向他们的房东施加压力以驱逐他们。这些教会成员还说，他们的大学和雇主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压力，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学校或者终止他们的工作。

据《卫报》报道，维吾尔人在住店方面面临困难，因为当地的酒店常常告诉维吾尔访客没有房间。有一个人开始被误认为是外国人。他说，后来酒店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身份证上写着维吾尔一词，便不准他入住。酒店都必须向当地警方报告客人情况，经营者会因允许维吾尔人入住而受到惩罚。

4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的中福迦南地教会牧师的儿子说，教会的房东最终屈服于当局终止租约和切断教堂电源的压力。牧师的儿子说，教会面临“持续不断的迫害”，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反复骚扰教会，闯入教会所在地，并因当局声称的安全或火灾隐患而要求教会成员离开该处。

7月5日，据报道，广东省深圳的一名维吾尔妇女在网上发布了一封给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的信，抱怨自己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人士在寻租公寓方面遇到的令人沮丧的限制。该维吾尔妇女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深圳的一个大公司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她的多个房东在接到当地人的一些负面意见之后，都终止了与她的租约。当地官员告诉该妇女，他们要求她的房东和她本人每个星期向警方报到，她说没有房东愿意这样做。到年底为止，该妇女住在一位同事的公寓里。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大使以及其他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代表不断地和公开地对中国践踏宗教自由表示关注。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所任大使会见了遭到宗教迫害的幸存者 and 他们的家人，包括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基督教人士。在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迫害的范围和程度在不断扩大……与其他宗教少数民族一起，佛教徒、穆斯林人士以及基督教徒经常遭到打击。”其月21日，美国国务卿说：“成千上万以至于几百万维吾尔人违背个人意愿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们被迫忍受严厉的政治灌输和其它可怕的迫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被毁灭。我们也关注中国政府针对基督教徒的新一轮的严厉镇压，包括关闭教会、焚烧《圣经》，以及迫使教徒签署文书放弃信仰等令人发指的行径。”

在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加拿大、科索沃和英国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代表，我们对中国严厉限制宗教自由表示深切的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国的许多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包括维吾尔族、

回族以及哈萨克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都因其信仰而面临严重的镇压和歧视。这些群体一直在报告各种事件，当局被指由于登记过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举行的与其宗教信仰有关的和平的敬拜活动而对他们的成员实施酷刑、身体虐待、任意拘捕、羁押、判刑或骚扰。”

为了倡导更大的宗教自由和宽容，并获得政府和管理宗教事务方面的政策信息，大使馆官员定期会见一系列管理宗教事务的中国政府官员。

包括大使在内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敦促中国中央和地方级别的包括外交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在内的政府官员对宗教自由实行更强有力的保护，并释放良心犯。大使与高层官员进行私人外交时强调宗教自由。国务院、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经常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包括那些因宗教原因而入狱的人。

美国大使，还有驻成都、广州、上海、沈阳以及武汉的总领事以及其他大使馆和领事馆官员与宗教团体和学者、非政府组织、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以及宗教囚徒的家人会面，以强化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支持。例如，大使在云南省宗教少数群体人口密集的地区访问了两个久已存在的基督教教堂，与当地神职人员见面。同样的，总领事也在云南会见了穆斯林和基督教领袖。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官员在宗教节日举办一些活动，与宗教领袖举行圆桌会谈来传达宗教多元化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了解宗教社区面临的问题。大使馆向美国宗教社区和与这些宗教社区有关联的美国政府机构介绍中国宗教领袖和成员。

本年度中，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向当地大量的受众发送促进尊重、理解和宽容宗教多元化的信息。通过由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做的一系列讲座，大使和总领事与听众探讨了多个宗教自由问题。1月，一个由大使馆赞助的访问人员与北京的听众探讨了美国的宗教团体在塑造公共和私人体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在1月，一名总领事馆官员在广东省广州市主持了一个关于美国穆斯林社区的讨论会，涉及到美国宗教冲突的问题，强调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之间的联系，并激发了有关多元社会对少数群体必须持有的容忍度的辩论。5月，沈阳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讲述了美国主要宗教的历史渊源，详细解读了美国宪法对宗教表达的保护，并引导听众进行讨论，并就包括法治、公民权利和种族平等话题作出评论。6月，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讨论会，内容是关于美国同性恋社区与宗教社区不断发展的互动关系，重点在于宗教团体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6月下旬，上海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讲解了近

期发生在美国的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法律案件，并协助听众就为宗教团体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的框架进行讨论。大使馆在7月主持了一个电影导演的报告会，由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关于穆斯林社区试图提升性别平等的纪录片。导演就宗教传统内外的平等与宽容的价值与数百名听众展开了讨论。同一个月里，广州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作报告，展示了关于政治中的宗教的研究，包括宗教教会在政治活动中起到的历史作用。

美国大使馆通过大使馆网站、微博、微信和推特账号的贴文直接向中国公民大力推广美国国务院有关宗教自由的倡议。在那些社交媒体账号上有关7月举行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一系列共六个贴文获得了600多万次的浏览和4万6141次的网民直接参与。关于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4个贴文获得了140万次浏览。在宗教节日期间，大使馆社交媒体团队分享了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大使的节日问候。这包括了对穆斯林、犹太、基督教和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日的祝福。数以百万中国公民看到了这些节日祝福信息，这些信息又转而引发进一步的评论和问题，例如，“伟大的国家必须有宽广的心胸！”“社会已经到了不容许人阅读《圣经》的地步”，以及“你们如何保护无神论者的宗教自由？”在该年度中，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基本上定期回答数百万网上关注者提出的有关宗教宽容的问题，向他们提供美国在宗教自由和宽容方面独到的观点。

当局接连不断地骚扰和恐吓宗教领袖，告诫他们不要与美国官员交谈。当局中断了一名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住持与成都总领事的见面，迅速从现场将该住持带走。当局经常阻止宗教社区的成员参加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活动，安全人员对参加过活动的人员问话。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一位著名的牧师在与成都总领事会面之后，当局跟踪并骚扰他和他的家人。本年度至少发生过三次，安全官员威胁藏传佛教领袖，并强迫他们在最后一刻取消与到访中国西南部的美国政府高层人员的会面。4月里，在得知一名藏传佛教住持会见了副领事之后，他们审问了该住持，延迟了他返回自己位于另一个省的常驻寺庙。

12月11日，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所任大使说，“长期以来中国对待穆斯林、基督教、藏传佛教以及法轮功成员的方式是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的原因。”

自1999年以来，按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由于参与或容许特别严重的践踏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CPC）。¹¹

月 28 日，美国国务卿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并提出以下相关制裁：根据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公法 101-246）第 402（c）（5）节，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口控制犯罪和安检的仪器设备。

西藏：201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TAR）和在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活动的保护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且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中央政府在 2 月 1 日实施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并对宗教性质的学校、捐赠和旅游等活动实施了新的限制。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当局继续广泛干预宗教活动，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由于宗教活动而导致的强迫失踪、酷刑、身体虐待、未经审判的长期拘留和逮捕个人的事件时见报端。旅行限制阻碍了传统的宗教活动和朝圣。很多消息来源都说，在政治敏感事件和宗教纪念日以及达赖喇嘛的诞辰时，镇压有所增加。抗议政府政策的自焚导致死亡的事件仍在继续，据报，有四人在这一年里自焚身亡。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TCHRD) 5 月份的报告称，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再教育营里发生了包括对藏传佛教尼姑进行性虐待等在内的酷刑。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说，当局还对囚犯进行集体惩罚，剥夺他们的食物和睡眠，让他们长时间面壁站立并殴打他们。当地消息来源说，在这一年里，当局继续实施一项持续多年的项目，驱逐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的大约 3000 名僧尼，摧毁了多达 1500 座他们的住所，并迫使许多僧尼接受“爱国主义和法律再教育”。当局经常为他们干涉藏传佛教寺院辩解，说这些宗教机构从事分裂主义或支持独立的活动，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经常诋毁达赖喇嘛，并禁止西藏人敬拜达赖喇嘛和那些与他相关的宗教领袖。

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一些藏人在求职、经商或朝圣旅行时遭遇社会歧视。由于民族特征和宗教习俗往往密切相关，许多事件很难归类为完全基于宗教信仰。

美国政府一再敦促中国当局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西藏人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保留、实施、传授和发展他们的宗教传统和语言。7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会见了前西藏政治犯果洛晋美，强调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西藏宗教自由。美国政府官员向中国政府高层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严厉限制西藏人民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力所感到的担忧。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官员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审视威胁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其独特语言的政策，

包括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持续进行的拆除活动。美国官员强调，达赖喇嘛转世的决定应该完全由宗教领袖做出，并对班禅喇嘛的持续失踪表示担忧。尽管外交官进入西藏自治区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但美国在本年度已经进行了四次访问。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根据中国 2010 年 11 月最新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西藏自治区有 271.64 万藏人，占总人口的 90%。汉族人约占 8%。其余是其他民族。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汉族人和在那里生活的其它非藏人数字被大大地低估了。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 24.4%，四川省的 2.1%，甘肃省的 1.8%，云南省的 0.3%，不过，在这些省内被指定为藏族自治地区的区域内，藏人的比例要高得多。

大多数藏人信奉藏传佛教，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信奉苯教——这是一种在佛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土著宗教；还有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一些学者估计，在青藏高原各地有多达 40 万苯教信徒追随达赖喇嘛，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藏传佛教徒。学者们还估计，在西藏自治区有多达 5000 名藏人穆斯林和 700 名藏人天主教徒。传统藏区的其它居民包括汉族人，很多信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孔教、传统的民间宗教，或声称是无神论者；还有回族穆斯林，以及非藏人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活动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却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宪法禁止国家、公众团体和个人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宪法规定不得利用宗教扰乱公共秩序、伤害公民的健康或者干预教育体系。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事务“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不过，只有五个属于国家批准的“爱国教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一的宗教团体才获准在政府登记注册，并可合法举行敬拜仪式或者其它宗教仪式和活动。

中央政府的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法规将政府控制西藏宗教领袖的挑选确定为法律，包括喇嘛转世。这些法规规定，根据喇嘛可能影响的地域，相关行

政部门可以拒绝认定某位喇嘛的转世，而且转世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国务院有权拒绝承认“格外有影响力”的高层喇嘛的转世。这些法规还规定，任何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预转世喇嘛的挑选，所有转世喇嘛必须在中国境内重生。政府有一份官方承认的转世喇嘛登记名单。

在西藏自治区内，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法规使国家能够控制藏传佛教的所有方面——包括宗教活动场所、组织和人员。根据国家《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框架下制定的地方法规，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的政府控制寺院、庵堂和其它藏传佛教中心的登记。管理办法还正式授权政府控制宗教建筑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寺院在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或者集会之前要获得官方的批准。

中央政府国务院修订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自2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要求宗教团体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对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提供设施”的业主加大了惩罚力度；同时，限制与海外宗教机构的联系，包括新规定的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必须要申请并获批，禁止宗教成员“受外国势力支配”。修订后的法规增加了对宗教学校的一些规定，将它们置于与宗教场所相同的监管之下，对从事商业或投资的宗教团体施加了新的限制，包括限制他们接受捐款的数额，并将宗教材料的出版限制在国家出版总署规定的指导方针内。此外，新修订的条例还规定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安全”。虽然现行条例已规定宗教团体有义务遵守法律和维护国家统一，但新修订的条例则规定了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具体步骤，不过没有明确界定极端主义。这些具体步骤包括监督团体、个人和机构，并建议采取惩罚措施，如暂停团体活动和取消神职人员的资格。新的条例还限制宗教团体的网上活动，规定这些活动要由省宗教事务局批准。

根据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讨论的意见，8月31日在西藏自治区的塔尔寺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要求西藏的僧尼接受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培训。这一政策要求僧尼除了在宗教研究方面表现出能力外，还要表现出“政治上的可靠性”，“能够给公众留下印象深刻的道德操守形象”，并愿意“在关键时刻发挥积极作用”。

宗教组织要建立宗教场所，必须在提出修建设施之前和在那个场所进行敬拜活动之前分别得到相关地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宗教组织必须提交数十份文件，以便在一次或两次审批过程中进行注册，包括其宗教活动的详细管理计划、详尽的财务记录和所有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没有经过正式登记手续的宗教团体不可能合法拥有一个固定设施或者敬拜聚会空间。因此，每

次他们想预定敬拜场所，例如租用酒店或公寓时，他们都要向政府机构专门申请批准每一次活动。无论是通过正式登记手续，还是申请批准每一次活动，未经事先批准都被视为非法宗教活动，可能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

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权拒绝任何建立宗教团体的申请。法规还要求僧尼在前往西藏自治区内其它地区或者县级城市“进行宗教崇拜”、从事宗教活动、学习或讲经之前，必须先获得原住地和前往县官员的许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州也有类似法规。

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制定和实施宗教管理政策，在五个“爱国宗教团体协会”（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支持下落实这些政策。在地方层面，要求党的领导和统战部、宗教事务局以及国家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的下属机构协调并在各寺院里执行宗教政策，很多藏区寺院驻有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包括公安人员。

中共党员，包括藏族党员和党员退休官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被禁止参与宗教活动。属于宗教组织的党员将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包括开除党籍。

政府行为

据报道，本年度有四名藏人自焚，以抗议政府的政策，而 2017 年有六人自焚。一些专家将自焚人数下降的报告归因于当局加强了管控措施。消息人士说，在这一年里，当局告诉家属不许讨论自焚案件。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报告说，自 2009 年以来，已经有 150 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他们所说的在中国统治下中共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侵略和对人权的侵犯。据媒体报道，16 岁的根敦嘉措 12 月 8 日或 9 日在四川省藏族自治州阿坝县自焚，他因伤势过重离世。媒体称，12 月 8 日，一名年轻的藏族男子周阔（据报道他在寺院的法名叫确吉嘉措）在阿坝县自焚，当时他高喊“达赖喇嘛万岁”！一些新闻报道他可能还活着。据报道，根敦嘉措和确吉嘉措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据西藏太阳报网站报道，11 月 4 日，另一名藏族青年多布在阿坝县自焚后死亡，据称他当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据报道，3 月 7 日，40 多岁的次阔在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时，高喊“达赖喇嘛万岁，西藏自由万岁”！他的遗体下落不明。之前，很多格尔登寺僧人都在阿坝县自焚。

有很多报道称，许多人因宗教信仰或践行信仰而被失踪、遭到酷刑、任意逮捕和身体虐待。

更登确吉尼玛是被达赖喇嘛和大多数藏人承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自 1995 年被中国当局强迫失踪以来，下落不明。据报道，更登确吉尼玛和他的父母同时被绑架，他当时只有 6 岁。当局没有提供有关他下落的任何信息，并曾声称他过着正常的生活，不希望受到打扰。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位最重要的上师。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TCHRD）是一家由流亡藏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5 月，该组织报道了一名西藏僧人讲述的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一个再教育营的酷刑和性虐待事件。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这位不知名的僧人在那曲县的再教育营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他说，除了“两、三个非修行人外”，所有的被囚禁者都是喇嘛和女尼。这位僧人说，被囚禁者必须参加自我批评会议和军训；营地官员还殴打那些身体虚弱、不懂中文的年长僧尼。这名僧人说：“许多女尼会在军训时晕倒，有时候警察就把晕倒的女尼拖到屋里，我看到他们抚弄女尼们的乳房，摸遍她们的全身”。他还说，一些囚禁者被单独挑出来，被用电警棍狠狠地殴打直至失去知觉，警察们再往他们脸上泼水，让他们醒过来。这种昏厥再醒来，再昏厥再醒来的过程会被折腾多次，最后警察用黑色塑料管抽打他们并用水浇湿他们全身各处，然后用电棍再打一顿，很快，受害者的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令他或她半死。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告说，当局对被囚者施以酷刑和集体惩罚，剥夺他们的食物、睡眠、让他们长时间的面壁站立并殴打他们。

据《西藏邮报》报道，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寺当过僧人的次旺南杰说，当局在他服刑期间对他进行了酷刑折磨，导致他的双腿遭受永久性伤害。当局于 1 月 24 日释放了服刑 6 年的次旺南杰经师，2012 年，他因参与和平抗议中国在西藏的政策而被捕。

由于获得在押囚犯的信息有限，因此难以确认因其宗教信仰或相关原因而被监禁的确切人数，难以确认他们受到的指控，也难以评估他们遭受虐待的程度和严重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存有 4037 份西藏政治犯的记录，截至 12 月 21 日，已知其中 300 人被拘留或监禁。据报，这其中 131 人是现任或前任僧尼，或藏传佛教转世经师。在现有的 120 个已知的案件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刑期从两年到无期徒刑不等。包括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内的观察人士认为，西藏政治犯和在押人员的实际人数要比

这个数据高得多，但是由于无法接触到囚禁者和监狱以及缺乏可靠的官方统计数字，很难对被囚人数作出准确的判断。当局继续将人数不详的囚禁者关押在拘留中心而不是监狱。

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消息来源称，12月10日是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周年纪念日，阿坝县警察狠狠殴打了来自格尔登寺的僧人桑吉嘉措，当时他为西藏的自由而进行抗议。警方拘留了他，截至年底他仍然下落不明。

非政府组织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称，2月，当地政府拘留了西藏自治区那曲县玛克村的村长嘎玛，原因是嘎玛对一项官方命令提出异议，该命令要求他签署一份同意政府在色扎山上开展采矿活动的文件。当地藏人认为色扎山是一座神山。加拿大西藏问题委员会也发表了一份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告。报告说，4月，在嘎玛村长被拘捕的消息被泄露给西藏流亡团体之后，警察拘留并殴打了大约30名藏人，其中至少有两名是僧人。当地消息来源称，至2018年年底，嘎玛村长仍然下落不明。

据新闻门户网站“故乡网”（Phayul）报道，5月，西藏自治区当局拘留了索县的藏族男子岗吉，原因是他拥有达赖喇嘛写的宗教书籍和带有这位宗教领袖教义的光盘。截止年底，岗吉依然下落不明。

据当地宗教界消息人士透露，9月5日至9日，安全部门分别拘留了来自阿坝县木鲁玛乡的三名藏族僧人。据报道，这些僧人抗议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抗议政府要求藏人年满18岁才能出家（在西藏历史上，学步儿童就可以开始学习成为出家人）以及抗议政府干涉寺庙的管理。9月5日，来自格尔登寺的多杰热丹在举行抗议后，立即被当局拘捕。9月6日，丹增格列抗议当局拘捕多杰，他随后也被拘捕。同样，9月9日，在洛桑达杰抗议多杰和丹增被拘捕后，警察逮捕了他。截止年底，三人依然下落不明。

据藏人行政中央介绍，1月28日，西藏那曲地区的洛珠嘉措在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后，被当局逮捕和拘留。在抗议活动之前，洛珠嘉措发表了一段视频，宣布他计划组织一次和平示威，支持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致力于世界和平与非暴力。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9月，当局拘留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果芒寺的僧人尼达、格桑、聂桑和曲吉，原因是他们公开抗议政府在他们寺院附近

修建的一个住宅项目。据报道，这四名被拘留者仍被关押在红原县，第五名僧人在被拘留后获释。

据自由亚洲电台 2 月份的一篇报道，2017 年年底，当局以一项未知的罪名判处一名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的藏族僧人扎西曲英有期徒刑 6 年。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曾在印度留学的扎西一直被当局隔离关押。宗教界消息人士说，扎西被判罪可能是因为他与印度媒体就道孚县的自焚事件进行了沟通。

6 月，媒体“故乡网”（Phayul）报道说，当地官员搜查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名藏人的住所，并逮捕了那些拥有达赖喇嘛照片的人。

自由亚洲电台 6 月报道说，当局释放了洛桑丹增，他曾是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的一名僧人，在 10 年刑期结束的前三年他被从监狱释放。2011 年，他因涉嫌支持一场自焚抗议活动而入狱。

当局继续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并对许多寺院进行粗暴的监视，包括让中共官员和公安人员常驻宗教场所和寺院，并在这些地方公开安装摄像监视系统。

省、地、县、地方各级政府继续在许多寺院附近或寺院内派驻中共官员，设立派出所或保安办公室。例如，根据当地消息来源和中国政府 2017 年的报告，西藏自治区有超过 8000 名政府雇员进驻在 1787 座寺庙里工作。在政治敏感事件和政治宗教纪念日期间，安全部队继续封锁进出重要寺庙的通道。

据四川省阿坝县的许多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官员将自焚者的家人、亲属和亲密朋友列入安全观察名单，以防止他们与国际游客会面和交流，在某些情况下，还剥夺了他们的公共福利。

当局会见了自焚者的家属，并指示他们不许谈论这些案件，以限制自焚和其他抗议活动的新闻在藏区内外传播。也有许多报告说，政府官员为此目的甚至关闭或限制当地的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服务。据报道，在去年 12 月的一起自焚事件之后，当局对该地区实施了“封锁”，并屏蔽了互联网通讯。

政府继续控制藏传佛教喇嘛转世的审批程序，监督藏传佛教的宗教教育。

据当地消息来源，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一位杰出的西藏宗教领袖，他于 2015 年死于狱中。当高级宗教领袖和当地藏传佛教人士试图寻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转世时，安全官员密切监控他们的行动，并威胁说如果继续寻找这位宗教领袖的转世，他们将被监禁。

政府继续坚称，1995 年钦定的确吉杰布是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而不是当年被当局失踪的更登确吉尼玛。大量藏传佛教僧人和学者说，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官员经常迫使僧人和俗人，包括政府官员，参加由班禅确吉杰布主持的宗教研习会，并下令所有山南市的藏人家庭派家庭成员参加 8 月份的法会，以确保成千上万的人向确吉杰布表达尊崇。1995 年，当局在班禅喇嘛传统的驻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确吉杰布举行传统的加冠仪式，从那以后每年夏天他都会重访扎什伦布寺。

此外，当局还密切监督许多关键的年轻转世喇嘛的教育。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一些藏区，由政府官员而不是由宗教领袖来继续管理挑选转世喇嘛的经师和世俗老师的人选，这严重背离了传统习俗。宗教领导人报告说，当局干扰喇嘛转世和僧侣的宗教教育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强调世俗生活的特点来鼓励这些年轻男子自愿不穿僧袍，而不是守规矩和过严谨的宗教生活。宗教领袖继续对这些和其他干扰感到担忧，担心藏传佛教的宗教传统能否世代传承。

据媒体报道，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政府在 2017 年批准的 1300 多名“活佛”名单上新增了 7 名 16 岁以下的“活佛”。据报道，这些活佛继续接受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培训。中国佛教协会宣布它所说的“权威性”的 1311 名“活佛”的数据库已经接近完成。达赖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都不在此名单上。

政府继续限制佛教寺院和其他机构的规模。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在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所在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政府从 2016 年开始持续不断地从这里驱逐僧尼。据人权观察和当地消息，在这一年里，政府从 2016 年至少 2 万人中又驱逐了约 2000 名僧尼，并拆毁了约 900 座住宅，剩下的人约为 5000 人。被逐出该学院的僧侣和尼姑返回他们的家乡，消息人士说，他们无法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接受“高质量的宗教教育”。据中国媒体报道，政府表示，拆迁是为了防止火灾并且加强人群控制。人权组织表示，如果安全是这次政府行动的主要动机，那么可以通过设立一些规定，如建造符合消防安全法规的住房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大规模的拆毁和驱逐。当地消息来源指出，拆除是为了给旅游基础设施清除

道路，并且阻止该地区以外的僧尼和俗人来该佛学院学习，特别是汉族人来佛学院学习。据报道，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领导人建议居民不要抗议拆除，希望籍此挽救佛学院。

1月，“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对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干预是“对宗教活动的极端控制”，“是对所有藏人宗教自由的直接威胁”，“长期而言，也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该组织还指出，“共产党对这所佛学院的干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据当地消息来源说，本年度，当局继续实施摧毁同样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一所佛教建筑亚青寺的计划，在这一年里，当局拆毁了至少 700 座住宅，并从 2016 年估计为 1 万名的宗教人口中又驱逐了大约 1000 名僧尼。据当地消息来源报告说，截至年底，亚青寺估计剩余人口为 5000 人。据当地消息人士报道，从亚青寺返回到自治区内的家乡的僧尼被当局告知，他们不得进入那里的任何寺庵，也不得参加任何公开的宗教活动。

据报道，当局继续在青藏高原的许多寺庵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活动，强迫僧尼参加“法制教育”，谴责达赖喇嘛，表达效忠政府认可的班禅喇嘛，学习普通话以及赞美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据报道，在许多地区，当局强迫 18 岁以下的僧尼离开寺院和佛学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从 2017 年起，有关部门已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寺庵中转移走了近 1000 名未成年人。据其他报道，当局从四川省理塘县最大的佛教寺院理塘寺（又名长青春科尔寺）带走了 600 名未成年人。当局从康区达孜县的甘丹寺带走了 20 名僧侣，并在 7 月 10 日从石渠县色须寺带走了多达 200 名年轻僧人。

消息人士还报道，从 3 月到 7 月，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起坞乡，有 77 名未成年人被带出寺院。为了方便转移未成年人，当局威胁他们的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和熟人，告诉他们如果不遵从官方命令，他们可能会失去社会福利和政府的工作。

7 月，媒体报道政府禁止西藏自治区所有未成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学校官员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协议，声明他们在夏天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

据媒体报道，西藏自治区教委、市人民政府和市教育局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家长在5月的萨嘎达瓦节期间带孩子去寺院，或让孩子参加宗教活动。据报道，当局还鼓励家长不要参加庆祝活动或去寺院。政府还要求学校通知教育局，哪些学生在萨嘎达瓦月内缺课并参加了节日活动。

8月31日(报道)，政府官员于5月31日至6月2日在拉萨为一批经过筛选的西藏僧尼举行了政治培训。培训课程旨在加强参与者的政治信仰，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寺院和社群传播中央政府的思想。政府没有透露参与的人数，但据人权观察称，2016年当局为250名藏族僧尼举办的政治培训课程是此次培训的试点项目。

据《环球时报》12月报道，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启动了为期5年的藏传佛教经师培训项目，培训对象包括当地藏传佛教徒和僧尼。该项目实施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使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参与者需要学习国家政策、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现代知识和宗教研究。据报道，当地一名共产党官员表示，僧尼必须“牢固地树立政府权力高于宗教权力，国家法律高于宗教教规的观念”。这个项目的启动与另一个专门为常驻西藏寺院的官员们开设的培训课程同时进行。官员们必须参加为期三年的培训课程，按照法律法规管理寺院，“更好地”为僧尼开展宗教事务提供服务。

尽管有报道称许多西藏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有宗教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继续禁止其党员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西藏自治区政府惩罚了追随达赖喇嘛、暗中信教、到印度朝圣、或将子女送到西藏流亡人士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

政府官员经常公开诋毁达赖喇嘛，指责“达赖集团”和其它外部势力煽动藏人举行抗议活动，表示这种行为是企图“分裂”中国。4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继续号召全区僧尼“坚决与‘达赖集团’作斗争，捍卫祖国统一”。5月，吴继续指示各党政机关，“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确保政治安全”。西藏自治区当局继续禁止在给小孩起名字时将达赖喇嘛的姓名或者达赖喇嘛加持的一系列名字放在小孩的名字当中。

多个消息来源报告说，几乎在所有地方仍禁止公开崇拜达赖喇嘛，包括展示他的照片。很多地方官员认为达赖喇嘛的照片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他们在高层官员来访期间摘掉寺院和私人住宅中的达赖喇嘛照片。政府也禁止

展示更登确吉尼玛的照片，他是达赖喇嘛和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徒承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县里，展示达赖喇嘛像所受到的处罚包括驱逐出寺院和刑事起诉。

虽然当局允许进行一些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但他们继续对宗教领袖的活动和俗人的宗教聚会保持严密的控制，将许多宗教活动限制在官方指定的敬拜场所，限制或者取消宗教节日，并防止僧侣前往村庄参加政治敏感的活动和宗教仪式。政府镇压那些被视为展示政治异议手段的宗教活动。例如，地方当局下令许多寺院和俗人不得庆祝或者组织公开集会庆祝达赖喇嘛在 7 月的 83 岁寿辰、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起义周年纪念或者 2008 年 3 月 14 日整个青藏高原爆发“动乱”的周年纪念日。西藏自治区当局在这些纪念日期间禁止僧尼离开他们的寺庵。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四川省和甘肃省有关部门在藏区的主要寺庵进行了巡视，并警告说，那些举办特别活动或者庆典活动的人要承担严重后果。据当地消息人士报道，7 月，宗教事务官员指示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和道孚县寺院的高僧不得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因此，僧侣们没有组织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消息人士称，他们担心违抗政府命令的严重后果，包括担心死亡。据消息人士透露，甘肃省官员会见了拉卜楞寺和博拉寺的高僧，并指示他们不要公开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当局警告说，如有违抗，这些僧人将面临法律后果，但没有具体说明后果是什么。

当局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部署了部队，监视祈愿活动。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在 2 月庆祝藏历新年期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区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四川省炉霍和道孚的寺院，以及格尔登寺，青海省的塔尔寺的祈祷仪式上部署军队。有关部门在拉萨举办了一系列指导僧尼遵守党的政策的会议，并视察驻扎在西藏佛教寺院的“武装部队”和中共官员。9 月，政府以过于拥挤和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为由，禁止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祈愿活动，这项禁令标志着政府连续第三年不允许举办这个曾经持续了 21 年历史的节日庆典活动。

据报道，西藏自治区政府严格控制藏传佛教宗教文物的使用，并宣布藏传佛教文物以及宗教建筑和机构都属于国家财产。

消息来源继续报告说，安全人员专门盘查穿着宗教服饰的人，特别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昌都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人，在拉萨和其它城镇街头随意盘问他们。据报许多西藏僧尼在寺院外或中国各地旅行时选择不穿宗教服装，以避免这类骚扰。

据报，传统的寺院制度继续衰落，因为许多顶级佛教经师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流亡，或者客死他乡，当局也不允许一些从印度返回藏区的经师讲经或者领导他们的机构。藏传佛教主要教派的领袖都在境外流亡，包括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法王、噶陀格泽仁波切和苯教领导人曼日赤增隆多达瓦达吉仁波切。政府还禁止在印度训练过的西藏僧侣回到中国的西藏寺院讲经，这些僧侣大多接受过达赖喇嘛或与之有关的喇嘛的教育。5月，《今日印度》曾报道，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表示，必须加强监管，不能让“达赖集团”在境外接受教育的僧人利用“当地佛教徒从事分裂活动”。

多个消息来源还报告说，过去四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藏传佛教僧侣到中国各个城市讲经或进行国际交往。当局还限制藏人在中国境内旅行，特别在敏感时期，限制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到西藏自治区旅行，包括拉萨（藏历新年）和萨嘎达瓦节以及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周年纪念日。

很多宗教人士在本年度报告说，他们很难进入西藏自治区讲经或者学习。政府还限制可以陪同那些获得许可的人前往西藏自治区的僧人的数量。藏传佛教僧尼说，这些限制有损寺院的教育质量。2008年拉萨骚乱后，许多僧侣被驱逐出西藏自治区寺院；2009年到2015年间一系列自焚事件以后，很多僧侣又被逐出格尔登寺；他们都还没有回来，有些僧侣不能回来是因为政府禁止他们返回。

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俗人，因宗教目的前往印度时继续遇到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公安局官员拒绝批准他们的护照申请。在另一些情况下，想要出国旅行的人只有在向地方官员行贿，或保证不前往印度，或承诺在境外期间不会批评中国在藏区的政策之后才能够获得护照。根据“人权观察”的一份年度报告，数百名持中国护照前往参加达赖喇嘛1月的一次讲经的西藏人被迫返回。12月，中国当局拒绝给西藏人发放新护照，或没收他们已经发放的护照，以阻止他们前往印度和尼泊尔参加达赖喇嘛的讲经活动。因此，与前几年相比，参加讲经的中国藏人数量大大减少。据当地消息来源说，甘肃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的许多藏人要等上5年才能拿到护照，而且官方对于耽搁这么久的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当局有时没收或注销先前发给藏人的护照，以防藏人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与达赖喇嘛有关的宗教活动。流亡在外的僧尼仍然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在印度的僧尼，他们很难或不可能进入藏区。

据报道，当局经常阻碍藏传佛教寺院提供宗教、教育和医疗服务。

根据政府政策，藏区内许多新建的安居房屋都位于乡和县政府所在地附近或者主要公路沿线。这些新建的住宅附近没有可供藏民前往进行敬拜活动的寺院，而且政府禁止未经批准建设新的寺院。传统上藏人的村庄通常聚集在寺院周围，寺院向社区成员提供宗教和其它服务。许多藏人仍然认为这种措施是中共和政府试图淡化宗教信仰、削弱寺院和社区之间的联系等而采取的措施。

当局继续将藏传佛教寺院与“分裂主义”和支持独立的活动联系起来，以证明他们的官方干预是合理的，官方媒体就是这样报道的。8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指示党员“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把独立自主自办作为藏传佛教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吴英杰说：“我们要揭露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根据对寺院管理的官方指南，各个委员会和工作组的领导和成员仍然只能是“政治上可靠、爱国和忠诚的僧人、尼姑以及党政官员”。西藏自治区的寺院日常行政事务过去主要由僧侣管理，而现在由寺院管理委员会和寺院政府工作组监管，这两个机构主要由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加上少数政府认可的僧人组成。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所有寺院以及其它藏区的许多主要寺院都设立了这样的机构。一名当地消息人士称，在这一年里，四川省藏区100%的寺院管理人员都是由中共任命的，包括格尔登寺。1月，人权观察报道称，201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当局将数十名中共官员安插在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各部门、各阶层，他们“将在大部分委员会和部门中占据近半职位，包括大多数领导职位”。文件显示，为监管僧尼而设立的六个“片区管理组”也将由中共官员而非僧人领导。

一些寺院的高僧继续报告说，他们与当地官员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只要政府对寺院的管理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当地僧侣就不会举行抗议活动或自焚。

西藏自治区中共党委和政府要求所有寺院在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和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五位共产党领袖的画像。

据当地消息来源说，当局继续妨碍藏传佛教寺院从事环保活动，这是传统的藏传佛教修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局担心这种活动可能在藏人中引发一种自豪感，尤其是在儿童中间，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

在某些情况下，当局继续对西藏自治区内外住在酒店里的藏人实施特别限制。据已得到几个酒店证实的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警方规定禁止西藏自治区的一些酒店和宾馆接待藏人顾客，尤其是僧尼，并要求其它酒店遇到藏人入住时要通知公安局。

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内容是该办公室所说的过去40年来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说，“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依法受到保护。目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78处，住寺僧尼4.6万人。西藏自治区现有活佛358名，其中60多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认定。截至2017年，西藏自治区已有84名学经僧人在拉萨获得高级学衔，168名僧人在北京获得高级学衔”。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由于民族特征和宗教习俗常常紧密交织在一起，很难把许多事件仅仅归类为宗教事件。藏人，尤其是那些穿传统和宗教服饰的藏人，经常报告说，酒店拒绝他们入住，出租汽车拒绝搭载他们，而且在就业或者商业交易方面受到歧视。

据当地消息人士称，11月，格尔登寺的13名僧侣预约到成都进行体检，但他们错过了预约的时间。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拉载他们，因为他们是藏族僧侣。成都的年轻藏人企业家报告称，一旦雇主当面确认他们是藏人，中国人的公司往往就会拒绝雇佣他们，尽管在此前的电话讨论时已经同意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的信息来源称，许多汉族佛教徒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向这些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捐款。藏传佛教僧侣经常访问中国各个城市，向汉族佛教徒提供宗教指导。此外，越来越多的汉族佛教徒访问藏传佛教寺院。不过有关官员有时施加限制，使汉族佛教徒很难在藏区许多寺院长期修行。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所任大使、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总领事等在内的政府官员，以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继续不懈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西藏地区的宗教自由。

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强调了藏传佛教因其信仰而面临的残酷镇压和严重歧视。他们会见了前西藏政治犯果洛晋美，强调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西藏的宗教自由，并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压制藏传佛教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表示担忧。副总统在部长级会议上致开幕辞时说：“近70年来，西藏人民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野蛮镇压。果洛晋美在表示反对中国人在他的家园的统治之后，被监禁和惨遭折磨。尽管他逃离了中国，他的人民还在继续为他们践行他们的信仰和保护他们的文化而战。我对果洛晋美说，我们对你的光临感到荣幸，我们钦佩你的勇气和你自由的执着。”

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办公室继续协调美国政府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的工作，并致力于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美国官员向中国政府各级官员一再提出西藏宗教自由问题，例如中国政府拒绝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及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进行的拆除行动。美国官员强调，只有宗教领袖才能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美国官员并对班禅喇嘛的持续失踪表示担忧。除了提出制度政策问题外，例如向藏人颁发护照的问题，美国官员还对一些个别的宗教迫害和歧视案例、事件等表达了关注和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并寻求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的途径。

11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会见了拉萨市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白玛旺堆。美国官员强调了维护西藏文化和宗教权力的重要性，并对西藏自治区政府未能保护当地藏民在公共场所自由崇拜和集会的权利表示担忧。

美国官员经常向中国政府最高层表示，他们担忧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了西藏人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的能力。

总领事在会见中国官员时呼吁西藏自治区政府尊重西藏人民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

美国官员同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宗教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广泛的接触，以监督宗教自由状况，尽管旅行限制和其它限制使他们难以拜访这些人并与他们交流。虽然外交官进入西藏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美国外交官在这一年还是访问了西藏自治区，当局在 4 月和 10 月两次批准了美国领事的访问，并在 5 月和 11 月两次批准了美国大使馆和驻成都总领事的正式访问。美国官员在去年 11 月访问西藏期间向自治区官员强调了尊重西藏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新疆：201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由于本年度特别对新疆地区发生践踏宗教自由的报道的广泛和严重程度，因此报告将新疆部分单列。

多家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估计，自 2017 年 4 月以来，政府在新疆特别建造或改建的拘留设施里关押了至少 80 万或可能高达 200 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成员，其中多数是中国公民。这些人由于他们信奉的宗教和所属的民族而未经审判就被强迫失踪、遭受酷刑、身体摧残和长期的关押。有在押人员死亡的报道。当局保持了广泛和粗暴的保安和监控，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关于个人的宗教归属和宗教活动的信息。政府继续以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的担忧为由制定并执行对新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的限制。随着对 2017 年 3 月颁布的一项新疆打击极端主义法规的执行，据报拘留行动加剧。该法规将许多种行为指认为“极端主义”。同时继续执行 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该法涉及到对付“宗教极端主义”。10 月，新疆的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规章进行了修订，加入了对“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的指导。新疆当局对举行祈祷的学童、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惩罚，并禁止青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包括斋月期间的禁食。政府争取从外国强行遣返维吾尔穆斯林并关押了一些返回的人。

维吾尔穆斯林报告了在就业和商业机会方面的严重社会歧视。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汉族人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

大使馆官员就对带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与政府官员会晤。据 7 月 24-26 日由美国政府主办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一份声明，“我们对关于中国政府加强镇压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包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表面上的政治再教育为由，在临时收容所和监狱等各种设施里关押数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报道感到特别担忧。在这些设施中有死亡的报道。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这些被任意关押的人。” 些月 21 日，美国国务卿说“不顾维吾尔人的意愿，将他们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他们在那里被迫忍受严厉的政治灌输和其他可怕的虐待。” 其 2 月 21 日，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持续被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时，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说，发生在穆斯林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情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状况”之

一。在 10 月，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在中国，政府对少数的宗教和民族进行迫害，与乔治·奥威尔描述的如出一辙。”她还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对平民的拘留行为”，“它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2015 年的一份关于新疆的报告中称，维吾尔、哈萨克、回、吉尔吉斯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在新疆有 1420 万居民，占新疆总人口的 61%。维吾尔族穆斯林主要居住在新疆。

第二节 政府对宗教自由尊重的状况

法律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称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把对宗教活动的保护限制在“正常宗教活动”之内，却没有定义“正常”。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利相信或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只有属于五个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佛教、道教、穆斯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团体可以被允许在政府注册并合法举行祭拜或其他宗教仪式和活动。

新疆有自己的反恐怖法律，包含与国家法律相似的关于“宗教极端主义”的规定。该法律禁止留长须、穿戴遮住整个脸部的服饰、除了食物之外的哈拉活动、“干扰”计划生育、婚礼、葬礼等其他规定。

1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关于新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报告，称政府依法推动标准汉语的使用，发布依法出版和发布的宗教文本，并为新疆所有民族的多元文化遗产提供“重要的法律保护”。

10 月，新疆地区政府颁布了反恐法实施条例，允许建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政府也称之为“教育中心”和“教育改造机构”）“实施反极端主义思想教育”。修订后的条例规定，“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机构要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进行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心理矫治、行为矫正，促进受训人员思想转化、回归社会和家庭。”

10月9日，新疆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地方政府有权坚持维护党的宗教工作基本原则，坚持法治，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它指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指导、协调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加强监狱管理，防范遏制极端化在监狱传播，做好相关改造、教育、转化工作。”

新疆乌鲁木齐的法规禁止覆盖面部的面纱，儿童在家上学和蓄“异常胡须”。2016年新疆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另一个条例禁止在政府建筑物中举行宗教活动和穿着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关的衣服。

新疆当局规定，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有26项宗教活动属于非法活动，包括一些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的活动。这些规定要求，未经政府事先批准，任何团体或机构均不得提供课程、经文研究小组或宗教研究课程。未经政府批准，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事任何宗教活动，包括讲道、传教、皈依和任命神职人员。它还禁止擅自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复制、制作、分发、销售和传播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新疆官员要求未成年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然后才能在校外接受宗教教育。新疆法规还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并对“组织、诱惑或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实施处罚。据新闻报道，自2016年起实施的一项法规进一步禁止新疆学校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并规定“组织、诱惑或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的父母或监护人可能被任何人拦截并报警。新疆区域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受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影响的儿童和/或严重危害社会但不构成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可以根据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学校的要求送到“专门的管教学校”。新疆当局继续禁止给孩子起任何具有伊斯兰含义的名字。

政府行为

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道，自2017年4月以来，新疆政府继续提出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的关注，以此为由拘留了大约80万至200万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成员，大多数是中国公民，处于类似监狱的环境。根据7月份对华援助协会的一篇文章，基督徒也被拘留在同样的设施中。有关于在拘留期间死亡和失踪的报告。政府主要根据其民族和宗教身份对个人进行拘留，据报告，被拘留者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虐待。作为2014

年开始的“严打”活动的一部分，警方搜查和政府对于伊斯兰活动的限制在全年持续进行。然而，当地观察员说，许多与对维吾尔人的虐待或压力有关的事件没有报道给国际媒体或非政府组织。

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两名维吾尔族宗教学者穆哈默德·萨利·阿吉（Muhammad Salih Hajim）和阿布都拉艾赫德·麦合苏姆（Abdulnehed Mehsum）在拘留营中死亡。当局于2017年底拘留了阿吉和他的几名家庭成员，1月份维吾尔人权项目得知他的死讯。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说，麦合苏姆于2017年11月在和田被拘留期间死亡，但他的死亡直到5月才公布。

据《卫报》8月报道，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一位名叫卡里姆（Karim）的维吾尔族人被抓入狱，并“在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后死亡。”他曾居住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一些国家，并在中国一个大城市拥有一家维吾尔餐馆。

11月28日，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说，在被拘留期间，她看到和她同住一间牢房的68名女性中有9名在3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死亡。

还有自杀事件的报道。一个维吾尔维权组织报告说，有10名以上维吾尔族妇女在这一年中直接由于当局的压力或虐待而自杀。据报道，官员们来到她们的家中说，要么这些妇女必须嫁给汉族男子，要么官员会将他们的父母拘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自杀了。

《纽约时报》、自由亚洲电台和维吾尔人权项目报道了年内几位维吾尔族学者和大学行政人员的失踪。维吾尔人权项目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确认当局已经造成231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失踪、被撤职、被监禁或被送往拘留所。

10月，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维吾尔文学教授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Abdukerim Rahman）、阿扎提·苏勒坦（Azat Sultan）和海來提江·乌斯滿（Gheyretjan Osman），语言教授阿尔斯兰·阿卜都拉（Arslan Abdulla）和诗人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Abdulqadir Jalaleddin）失踪，据信被关押在拘留所。

自由亚洲电台 9 月份报道，喀什大学的两名管理人员（Erkin Omer, Muhter Abdughopur）和两名教授（Qurban Osman 和 Gulnar Obul）被撤职，他们的下落不明。

国际媒体报道，新疆大学前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和新疆医科大学医院前院长哈姆拉提·乌普尔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8 月，《纽约时报》报道，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曾进行过关于维吾尔文化的广泛的演讲和写作，在告诉亲戚她打算于 2017 年底从乌鲁木齐前往北京之后的某个时候失踪。她的家人和朋友说她的秘密拘留是政府镇压维吾尔人行动的一部分。

3 月，多伦多《环球邮报》采访了堪培拉临床社会工作者努尔古丽·沙吾提，她说自年初以来，她至少有 12 名家庭成员在新疆失踪。沙吾提还表示，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在新疆的 54 名亲戚和好友失踪，推测是在拘留设施中。文章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家和前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家族的 30 多名成员已经消失或被拘留。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广播员丽恰克热·霍迦说，她的亲戚中有 20 多人失踪，是政府干的。该文还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米西索加市的阿达莱特·拉希姆说，他的一个兄弟和六个表兄弟正在参加强制灌输计划。她的父亲阿卜杜拉齐兹·萨塔尔说，他大约 50 名亲戚在新疆被监禁，其中包括官员、教师和医生。

据美联社报道，16 岁的维吾尔人帕克特·古尔班继续失踪，他于 2016 年从伊斯坦布尔抵达乌鲁木齐机场，准备去看望他的祖母。

有许多报告称当局对被拘留者进行酷刑和其他身体虐待。

10 月，对华援助协会报告了维吾尔族在几个拘留所经历的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拘留体系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每个营地都包括 A 区，B 区和 C 区。看守首先将“新来的人和穆斯林”安置在 C 区，这是最糟糕的区，看守在 24 小时不给他们食物或水。看守铐住他们的手脚，殴打他们，喊叫着侮辱他们，直到他们反复感谢中共和习近平主席。然后看守将他们转移到 B 区，在那里他们吃劣质食品，允许使用浴室。他们每天放风 15 分钟唱国歌。然后看守将那些被认为在共产党信仰方面成功接受再教育的人转移到条件较好的 A 区。

9月份的人权观察（HRW）报告题为《消除意识形态病毒》，其中有一份新疆拘留中心的描述，曾经被拘留的人描述了审讯和酷刑，包括殴打，工作人员将被拘留者吊在天花板和墙壁上并给他们长时间戴镣。被拘留者还报告说，他们被关非常拥挤的空间，无法让所有的人一起入睡。一名被拘留者说，被拘留的人在从牢房中被带走时都害怕遭受酷刑，一名难友给他出示了被吊在天花板上以后留下的伤疤。在被吊了一晚后，他说他会同意任何事情。一个人说看守将他铐在床上，所以他最多只能坐在或站在一个地方。看守告诉他，他们会像对待杀人犯一样对待被拘留者。他们还说，新疆有一项全区范围的命令，所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都要戴上脚镣手铐，双脚和双手之间只有五到六节“铁环”，这使得活动非常困难。

5月，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一名87岁的哈萨克族男子称他在新疆维吾尔族拘留所遭受酷刑。他说，当局用高音扬声器播放噪音，导致许多囚犯陷入昏迷状态。他还说，当局强迫穆斯林饮用劣质酒，吃猪肉，违背他们的宗教信仰。另一名了解情况的哈萨克族人说，监狱官员强迫被拘留者戴上一种每天发出噪音21小时的特殊头盔，导致许多人精神崩溃。

9月，《卫报》报道，哈萨克族穆斯林凯拉特·撒马尔罕被关押在 Karamagay（Karamay? 克拉玛依）郊外将近四个月。他说，他被迫穿着一种“铁衣服”，这些衣服由爪子和棒子组成，使他不能动，保持双手和双腿伸展。他说有一天他拒绝铺床，看守就强迫他在一天内穿了12个小时。据撒马尔罕说，看守告诉他，没有宗教信仰，政府和党会照顾他。撒马尔罕告诉《华盛顿邮报》，拘留设施中的看守为违犯规定的被拘留者戴上手铐和脚镣长达12小时，并对被拘留者施加水刑。

7月，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看守强迫一名拘留所的妇女服用不明药物，她的头发脱落。这名妇女说，监狱当局给被拘留者戴上手铐，并让他们每天穿上44磅的盔甲，每天3至12小时。看守还剃掉了维吾尔族女性的头发，其中一些女性认为她们的头发是神圣的。曾经被关押的赫拉提·沙马尔罕（Helatti Shamarkhan）说，他看到被拘留者被强行接种疫苗和用药。

9月，人权观察报告说，一名前被拘留者说当局将他放入一个约2米x2米（43平方英尺）的小型单独监禁牢房。他们不给被拘留者任何食物或水，将他的手铐在背后，并强迫他站立24小时不睡觉。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报道了新疆穆斯林因“不值得信任的行为”被逮捕和拘留，如参加宗教教育课程，拥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穿着有伊斯兰标志符号的衣服，以及前往某些县。还有报道说，在父母被送进拘留营后，当局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孤儿院。

《经济学人》报道，新疆当局使用详细信息，根据各种标准对公民的“可信度”进行评级。官员把人们分为可信、一般或不可信，具体取决于他们属于以下哪个类别：15至55岁（即军人年龄）；是否维吾尔族；是否失业；是否有宗教知识；是否每天祈祷五次；是否有护照；是否访问过26个国家之一；是否曾经签证逾期居留；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外国（土耳其至少有1万维吾尔人）；以及孩子是否在家上学。《经济学人》说：“……这个目录明显是种族主义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而被怀疑。”被贴上“不可信”的标签可能导致被当局拘留。

人权观察报告称，这26个“敏感国家”是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

国际媒体报道称，政府发布了一些指导方针，警告官员要注意75个“迹象”或显示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这些指导方针包括留胡子，在清真寺外公共场所祈祷，以及戒烟或戒酒。自由亚洲电台11月份报道，新疆和田的政府当局正在使用一套扩大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其他行为，例如人们在祈祷时如何站立，以及用指甲花把头发染成红色。据另一个消息来源称，当局认为红头发是从属极端宗教团体的标志，因为有些人说先知穆罕默德有红头发。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官员以拘禁威胁那些不遵守行为清单的人。当局还向学生施压，要求他们向老师报告有关其家庭宗教活动的信息，然后他们会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安全官员。

7月，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发表报告称，根据中国政府数据，新疆的刑事逮捕数字占2017年中国所有逮捕数字的21%，而新疆人口占中国的总人口的比率不到2%。中国人权捍卫者报告称，2013 - 2017年期间新疆逮捕比率增加了300%以上，而前几年则为5%。中国人权捍卫者报告说，尽管政府没有提供被逮捕者的民族分类，“……按照人口百分比刑事处罚会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体。”

7月25日，中国人权捍卫者报告，一个新疆村庄的官员拘留了当地的伊玛目，并强迫他提供学生的名字。此后不久，当局拘留了一名村里的木匠，因为他10年前曾读过《古兰经》学习班。

9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阿卜杜萨拉木·木合买提说，新疆警方因为他在一个葬礼上背诵古兰经的一节经文而逮捕了他。新疆居民说，人们可以因为去国外探亲、拥有关于宗教和维吾尔族文化的书籍、甚至穿着带穆斯林新月形的T恤而被当局逮捕。文章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消除对伊斯兰教的任何忠诚。

据人权观察报告，一名目击者说，他知道“三个餐馆老板……经营‘伊斯兰’餐馆。他们被拘留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在他们的餐馆里吸烟或喝酒……[当局]正在禁止有关伊斯兰的一切。”一名曾经被拘留的人说，拘留中心当局不允许人们说“色兰”，这是一种宗教问候，而是强迫他们只说普通话。这个曾经被拘留的人还说，如果他使用突厥语单词，官员会惩罚他。

9月美联社报道，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古尔查·塞利（Gulzar Seley）和她的男婴在返回新疆探望家人时被监禁。根据仍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塞利的丈夫的说法，当局在她抵达乌鲁木齐机场后不久将她拘留，并带到了她的家乡克拉玛依。在被释放一小段时间后，她打电话给她在伊斯坦布尔的丈夫，告诉他，她和她的儿子将不会回来了，因为没有时间。然后她就失踪了，但她的丈夫说，他后来了解到，她和他们的儿子在监狱里。

据《卫报》报道，6月，乌鲁木齐警方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妇女古丽判处15天拘留，因为她没有携带她身份证明。地方当局此前曾对她进行了审问，理由是有报道称她戴着头巾并祈祷。古丽将她的拘留设施描述为一座长型的单层建筑，关押了大约有230名女性。她说，在看守所里面，看守强迫女性在大多数日子里唱两个小时的爱国歌曲，背诵一个十条的纪律守则，然后进行自我批评。一位女士告诉古丽，她在那里是因为警察在她的手机上发现了一条“开斋节快乐”的短信。当局在八天后释放了古力，并将她送回哈萨克斯坦。

根据2017年启动的一项政策，新疆当局建立了“福利中心”，旨在为孤儿提供国家支持的护理，直到18岁。根据7月份的《金融时报》报道，一名前拘留设施的老师表示，被拘留者的孩子被送到“福利中心”是因为他们的父

母有政治问题，因而禁止他们和“正常”孩子一起上学。同一篇文章说，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发布的公开招标表明，正在建造“数十个”孤儿院。据当地媒体报道，喀什地区的一个县仅在2017年就新建了18家孤儿院。

自由亚洲电台在7月和9月报道说，当局将父母被关押在拘留设施中的孩子安置在“小天使学校”。这些报道称，这些学校被围墙围住，墙顶有带刺的铁丝网。关于被扣押的儿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6个月至14岁的儿童被关押，由于安全方面的担忧，不允许他们外出。据报道，新疆南部地区一个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所在的设施严重拥挤，儿童“像饲养的动物一样被锁在小屋里”。他说，由于人满为患，当局“正在把孩子送往中国内地”，但他不确定他们被送到哪里。他补充说，从被拘留中心释放的父母到孤儿院寻找子女是“不可能的”。中和田地区于田县委书记说，约有2500名儿童被安置在两座新建的建筑内。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道说，政府限制了个人参与宗教活动的的能力，迫使新疆的穆斯林从事不符合其宗教信仰的活动。

《纽约时报》9月报道，和田的官员对伊斯兰教的做法设定了非常狭窄的限制，包括禁止有朋友或客人在场时在家中祈祷。居民说，警方有时会搜查家中的禁书和祈祷垫等物品，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里和地板下面是否有隐藏的东西。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称，2月17日，新疆伊犁当局下令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在所有墓地捣毁伊斯兰星和月牙符号。否则，当局会强行拆除坟墓。关于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在线杂志《寒冬》（*Bitter Winter*）报道，政府官员监督新疆的殡葬服务，并禁止穆斯林根据他们的信仰传统悼念他们的死者。2月，武装警察拘留了来自喀什市的维吾尔族共产党员艾兹买提，原因是几年前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进行了伊斯兰教的葬礼祈祷。截至年底，艾兹买提仍被拘留在一个秘密地点。当局还株连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强迫他们学习政府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6月份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当局在维吾尔族人口较多地区修建了九个“殡葬中心”，其中包括火葬场。维吾尔流亡社区的成员说，当局正在利用这些中心从丧葬仪式中剔除宗教礼仪。根据该文章，流亡社区的其他成员说：“当局利用这些火葬场偷偷‘处理’在反抗……宗教镇压期间被安全部队杀害的维吾尔人的尸体……或者在可疑情况下死在再教育营的人的尸体。”这个文章引用了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来自库车县的火葬

场的尸体中“很少”属于“再教育营地”的少数民族。消息人士说，少数民族的尸体被带到他所在的火葬场“通常都有警方提供的特殊文件”。

中国外交部继续否认国际媒体报道称当局禁止维吾尔族穆斯林斋月禁食，并称宪法规定了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然而，在新疆地方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报告表明，当局限制或禁止某些维吾尔群体过斋月，包括中共党员、其亲属、学生、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的员工，而是举办关于“宗教极端主义”危险性的教育活动。当局还举办了早间会议，以确保学生和工作人员吃早餐。据《独立报》报道，当局要求当地政府雇员强制性 24 小时轮班，并在整个月内的星期五为学生举办强制性体育活动和爱国电影放映会。根据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政府察布查尔县的网站，当局命令餐馆和市场在斋月期间照常营业，并且卖酒。

有报道说，当局禁止从初中到大学的学生在斋月期间禁食。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要求所有维吾尔族干部、公务员和养老金领取者签署一份承诺，表示他们不会禁食，并会争取劝阻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那样做。

政府为参加朝觐提供了便利，穆斯林在网上或通过当地官方伊斯兰协会申请。据媒体报道，当局惩罚试图通过政府安排的选择以外的路线进行朝觐的朝圣者。根据《环球时报》刊登的一份官方媒体报道，预计全年约有 1 万 1500 名中国穆斯林前往朝觐，而 2017 年为 1 万 2800 人。其中约有 3300 人接受 GPS 跟踪设备，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允许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整个朝圣期间实时监控他们的位置。据制造商称，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同设计了该设备。2016 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报告说，沙特阿拉伯对中国朝圣者的年度配额比其他国家低。官方媒体称，新疆提供近四分之一的朝圣者，尽管独立消息来源称只有 1400 名维吾尔族穆斯林能够参加。这些数字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员和安全官员，他们被派去监督穆斯林公民并防止未经授权的活动。由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参与官方朝觐计划而制定的标准，维吾尔族穆斯林报告说，参与国家批准的朝觐旅行有困难。政府没收了新疆维吾尔人的护照，据维吾尔人说，在重新获得旅行证件方面几乎普遍失败。据媒体报道，60 岁以上的维吾尔人才能参加朝觐旅行的年龄限制也减少了前往麦加的人数。据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媒体报道，那些被选中参加国家批准的朝觐旅行的人必须接受政治和宗教“教育”。据报道，允许参加朝觐的维吾尔族人在朝觐期间每天都被迫参加政治教育。有关组织

报告说，在朝觐申请过程中，政府更优待回族穆斯林而不是维吾尔族穆斯林。据报道，选择在合法政府渠道之外旅行的穆斯林在试图通过第三国旅行时经常冒着被驱逐的风险。

9月，人权观察报道，当局开始要求新疆村庄的每个人聚集在一起举行每周一次的中国国旗升旗仪式。有一次，警察打了一个老妇人，让她脱掉头巾。当局没收了祈祷垫和《古兰经》的复印件。村庄管理部门禁止儿童学习宗教，即使在家里也不可以。

2月，对华援助协会报道说，尽管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官员仍强迫新疆穆斯林参加中国农历新年的传统庆祝活动。据一名哈萨克族男子称，当局强迫新疆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人吃猪肉饺子，这违反了伊斯兰饮食禁忌。如果他们拒绝，公安人员就会当场拘留他们。

当局继续阻止新疆的任何“非法”宗教活动，并在民族团结的名义下优先考虑中国语言和文化而不是维吾尔语和文化。当局提倡忠诚共产党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据报道，当局鼓励数以千计维吾尔人违反自己的意愿，穿着传统汉族服装，参加表演太极拳和唱国歌的仪式。人权观察9月份报道说，在新疆，官员要求个人参加政治灌输会议，有些人则需要参加普通话课程。

12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40年来人权进步的报告。报告说，国家为神职人员提供口译经文培训课程，自2011年以来，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培训了数百名来自新疆的伊斯兰神职人员。中央政府支持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

新疆当局维持了广泛和粗暴的安全和监视，据报道部分原因是获取有关个人宗教归属和活动的信息。

人权观察报告称，政府要求新疆所有人都在手机上安装间谍软件应用程序，因为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网络清理”来防止获取恐怖主义信息。未能安装应用程序（可识别给谁打过电话，跟踪在线活动，以及记录社交媒体的使用）被视为违法行为。据报道，公共场所的“Wi-Fi嗅探器”监控信号范围内的所有联网设备。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局、文化局和工商局继续对政府界定的宣传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录像录音制品进行限制。当局禁止在互联网

网、社交媒体和在线市场上传播此类材料。作为这些措施的一部分，警方随机拦住个人，检查他们的手机是否存有敏感内容。

9月，人权观察指出，在新疆，官员们使用问卷调查来检查人们的日常行为，将结果输入大规模的数据分析程序。据人权观察报道，任何宗教虔诚的迹象，以及“在家中存放大量食物”，或拥有健身器材，都可能被视为“极端主义”的迹象。人权观察说，政府的宗教限制已如此严格，以至于“实际上使伊斯兰教的活动成为非法活动。””

在2017年12月底，人权观察报告了新疆当局继续努力收集12至65岁之间所有居民的DNA样本、指纹、虹膜扫描数据和血型。这个行动大大扩展了当局收集生物数据的工作，超出了之前政府在该地区的这种努力，而过去的生物信息收集仅限于护照申请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局在说为人们进行免费健康检查，收集了新疆个人的DNA样本、面部扫描记录、录音和指纹，但当局拒绝提供“检查”的结果。政府研究人员在2013年和2017年提交的专利申请中表示，他们从维吾尔族人那里获取基因材料，并将其与其他民族的DNA进行比较，并能够按民族划分人口。人权组织和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说，收集基因材料是政府在新疆开展行动的关键部分。他们表示，政府将把信息汇编成一个综合的DNA数据库，用于跟踪任何抵制遵从政府意愿的维吾尔人。

根据9月份发布的一份人权观察报告，一名在新疆拘留所被关了数月时间的人说，5月份看守通过摄像机监视囚犯，迫使每个人都保持不动，直到大喇叭里传出声音告诉被拘留者他们可以放松几分钟。当囚犯去洗手间时，看守也看着。同一份报告详述了政府如何将监视扩展到拘留营以外的生活。2017年离开新疆的一名女子告诉人权观察，五名官员轮流在家监视她，记录他们监视的情况。根据该报告，政府官员出现在一起阅读政治宣传和准备铺床过夜的照片。该报告称，男性干部在有女性居民的家中过夜，导致妇女和女孩容易遭受性虐待。

在整个斋月期间，和田地区当局派出党员干部住在当地的居民家里。他们全天观察这些家庭，确保他们不祈祷或禁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名官员说：“在此期间，[官员]将了解人民的生活，协助他们的日常活动，比如种田，并宣传法律法规、党和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等等。”

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局已派出100多万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官员与新疆当地家庭一起生活。该报道指出，政府实行这种家庭入住是为了针对新疆南部的农民家庭，当局一直在这个地区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懈行动。该报告还指出政府要求家属在官员访问期间提供有关其个人生活和政治观点的详细信息。当局还让家人接受入住官员的政治教育。在某些地方，政府强制要求这些官员每月至少留住一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计划始于2014年。

新疆当地政府在网上一份声明表示，官员必须检查他们所居住的房屋是否有任何宗教元素或标志，并指示官员没收他们发现的任何此类物品。

8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除了新疆的大规模拘留外，当局还加强了对举报人的使用，并扩大了警方的监控范围，包括在一些人的家中安装摄像头。

5月，《经济学人》报道，在新疆和田，每隔300米（1000英尺）就有一个警务站。文章指出，政府称这些警察站为“便民警务站”。这些警务站是网络化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类似于陈全国在2011年至2016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时开始启用的那种系统，陈全国是现任新疆党委书记。当局将每个城市划分为许多方块，每个方块里约有500人。每个方块都有一个监控居民的警务站。报告补充说，新疆的每个村庄都有类似的“便民警务站”。

同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和田郊外一个大检查站的警察活动，一名警察命令所有乘客下车。乘客（都是维吾尔族）轮流进入一个检查亭，官员在里面扫描身份证，拍照和取指纹，使用新安装的虹膜识别技术，并迫使妇女脱下头巾。这些官员还强迫年轻的维吾尔人把手机交给当局，以便下载他们的智能手机内容，供以后分析。

政府限制人们进入礼拜场所。《经济学人》5月份报道称，和田当局关闭了居民区的清真寺，保留了少数的大型清真寺。该报道指出，警察强迫信徒在参加进入清真寺之前在他们那里登记。在喀什最大的清真寺，著名的朝圣地艾提尕尔清真寺，在入口处，两名警察坐在一条横幅下面，上面写着“爱党，爱国”。在里面，清真寺的一名工作人员为当地商人举办课程，讲解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乌鲁木齐，文章指出当局在允许保持开放的清真寺敲掉了尖塔和伊斯兰新月。其他报道称，新疆要求礼拜者申请清真寺

进入许可证的限制仍然存在。据当地消息来源称，当局禁止 20 岁以下的人参加清真寺的宗教仪式。

据报道，政府采取措施压制人权活动人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8 月 16 日，在著名的回族穆斯林诗人崔浩新（其笔名为安然）发出关于维吾尔人被大规模监禁在拘留营中的推文后，警察对他进行了威胁。据崔说，五名警察闯进他的家，警告他不要使用社交媒体。当局此前已将崔某送往中国东部参加为期一周的再教育课程，并因涉及新疆的诗歌和著作而短暂拘留过他。

据报道，政府还限制旅行，并试图恐吓或强行遣返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根据人权观察 9 月份的一份报告，在新疆，个人必须向警方申请许可，并通过多个检查站才能从一个城镇去到另一个城镇。人权观察还报告说，当局收回了该地区人民的护照，并禁止与国外的人，包括亲属进行联系。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人也报告说，在机场、火车站和路边的安全检查站增加了筛查。

《华尔街日报》8 月份报道说，中国安全官员让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族人收集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国外的几位维吾尔人报告说，政府拒绝为他们的护照延期，而是提供一个返回中国的单程旅行证件。一些人还报告说，当局威胁说，如果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族人不返回，他们的家人会被送进拘留中心。

人权观察报告称，9 月份，一名官员打电话给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突厥人穆斯林，并告诉他返回中国，威胁如果他拒绝就绑架他。该官员说，可能不是现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人权观察在 6 月份报道说，中国当局联系了居住在国外的 37 岁学生穆拉特，她的姐姐在中国的一个拘留所里，告诉她即使她在外国，也可以“管理”她。穆拉特说，她没有加入任何恐怖组织、任何反对中国的组织或参加过任何示威活动。

根据 8 月份的《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告，政府开始编制一个居住在国外的穆斯林公民的数据库。文章称，当局使用恐吓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维吾尔族公民的车牌号码、银行详细信息和结婚证书信息。

《经济学人》在3月28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人权组织发表的报告称，过去十年来，当局迫使数百名维吾尔族人从埃及、泰国、越南和其他地方返回中国。这些团体说，中国当局在外国拘留和审问一些人，有数百人是关在外国监狱里的人。中国官员经常在西南边界的两侧和整个中亚地区招募当地居民，报告“可疑”人员的到来。《经济学人》报告说，中国政府经常不经过任何正式法律程序就可以成功地将这些人送回中国。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由于政府和个人都和宗教、文化和民族密切交织，因此很难将许多社会歧视事件归类为完全基于宗教身份。新疆的穆斯林在找工作和保留职位时面临歧视。

在新疆，歧视维吾尔族的各项政策以及为汉族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加剧了维吾尔族穆斯林与汉族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大使馆官员经常对中国政府官员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待遇表示担忧。7月24日至26日美国政府主办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强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报道感到特别困扰……[包括]拘留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关在临时拘留中心和监狱等各种设施，名义上是为了‘政治再教育’。据报道，这些设施中有人死亡。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9月21日，美国国务卿说：“不顾维吾尔人的意愿，将他们关在所谓的再教育营，被迫忍受严厉的政治灌输和其它可怕的虐待。他们的宗教信仰被毁灭。”12月21日，在解释为什么中国仍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时，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说，正在穆斯林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状况之一”。10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晚宴上，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在中国，政府正在对宗教和少数民族进行的迫害，与乔治·奥威尔所描写的如出一辙。”她补充说，“这是当今世界对平民最大规模的关押”，“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

大使馆和领事馆一般通过微博和微信上的社交媒体帖子发布有关新疆宗教自由的直接信息。在四月份的一系列信息中，大使馆发布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新疆维吾尔族记者家属被捕的批评，推动了中国网民对新疆宗教镇压问题的热烈互动。7月，大使馆通过宣传宗教自由的社交媒体帖子，宣传在华盛

顿举行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激发了有关新疆穆斯林状况的网上辩论。大使馆和各个总领事馆编写了关于斋月和开斋节的祝福，由大使和总领事亲自发表，并且宣传了白宫、国务卿和其他人对伊斯兰节日的祝福。这些信息引发了穆斯林宗教自由问题的网上讨论，尤其是对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事务的讨论。大使馆和各个总领事馆一般编写每周的社交媒体内容，促进对宗教和民族多元化的容忍，一般是利用美国的例子引起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宗教自由的讨论。大使馆继续引起人们关注新疆具体的镇压案件，虽然政府审查人员经常在微博和微信上删除此类帖子，但推特上的讨论仍在继续。大使馆的推特粉丝经常参与有关新疆的公开的中文讨论，或者批评中国官方立场。

大使馆和各个总领事馆官员还直接与中国观众就穆斯林的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讨论。7月，大使馆主办了一部关于伊斯兰社会中性别平等的电影放映会和讨论，这部电影解释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斋月的仪式和戴头巾。1月，一位广州总领事馆官员就宗教自由发表了讲话，重点讨论了其在改善恐怖主义根源方面的作用，并引发了观众讨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作用。

香港：201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其它法律和政策规定，居民有信仰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纳入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法轮功成员报告说，他们一般能够公开行动，但他们也表示，他们受到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团体的骚扰，在租用场地（包括向特区政府租用）举行大规模活动时遇到困难。法轮功成员在 10 月举行集会，提高人们对中共在内地镇压法轮功 19 年的意识。

据报道，一些香港牧师与内地同行的交流受到内地法规变更的负面影响。宗教领袖报告主持和参与跨宗教的活动，例如当地一座清真寺和一座犹太教堂保持着宗教领袖之间的定期互动。

美国总领事馆在与政府会面时都确认美国政府支持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总领事和总领事馆官员定期与宗教领袖和社区代表会面，促进宗教平等。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美国政府估计总人口为 720 万（2018 年 7 月估计）。据特区政府统计，佛教信徒超过 100 万，道教信徒超过 100 万，有 48 万基督教徒，37.9 万罗马天主教徒，10 万印度教徒和 1 万 2000 名锡克教徒。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统计，约有 2500 名犹太人居住在香港。根据 2017 年《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约有 2 万 5000 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居住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估计，特区有大约 30 万穆斯林。也有少数巴哈伊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居住在特区。儒家思想很普遍，在某些情况下，儒家思想的元素与其他信仰体系结合在一起。法轮功估计香港约有 500 名法轮功成员。

基督教教派有数十种，包括圣公会、浸信会、基督教宣道会、中华基督教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天主教香港教区承认教皇并与梵蒂冈保持联系。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享有自主权。《基本法》规定特区的宗教团体与其内地同行在“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联系。《基本法》规定居民有信仰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基本法》还规定，政府不得干涉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或限制不违反其他法律的宗教活动。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纳入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包括单独或与他人、公开或私下、通过敬拜、遵守教规、信仰活动和教学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人权法案条例》规定，属于少数民族、宗教或者少数语言群体的人均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表达和从事自己的宗教，使用自己的语言。该法令还保护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确保其子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符合他们自己的信仰”。在宣布紧急状况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受到限制，而且在必要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健康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宗教信仰的“宣示”可能依法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得带有仅仅基于宗教的歧视。

法律并不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政府福利，如免税资格、租金补贴、政府或者其他专业发展培训、使用政府设施、或者申请资金以便提供社会服务时，就必须向政府登记。为了有资格获得这种福利，申请团体必须让政府充分相信，该团体建立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宗教、慈善、社会或娱乐。申请登记的组织必须提供组织的名称和目的，确定其管理人员，并确认主要业务地点和该组织所拥有或占用的任何其他场所。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就会列入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处，但政府不对任何登记团体的有效性作出判定。宗教团体可以登记为一个协会和/或者免税组织，只要他们至少有三名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身份证件的人员就可以。登记过程通常需要大约 12 个工作日。根据法律，法轮功没有归类为宗教团体，它登记为一个社团，据此，它在香港的分支可以设立办公室，向成员收取会费，并且具有合法地位。

《基本法》允许私立学校提供宗教教育。宗教团体建造和管理的学校如果提出资助申请，政府会提供补贴。得到政府资助的学校必须符合政府的课程标准，而且不得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受学生，但它们可以把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属于非必修课。教师不得由于学生的宗教信仰而对其歧视。

公立学校的课程规定必须有道德和宗教研究，重点是宗教宽容。政府课程还包括世界不同宗教的选修课。

宗教团体可以通过民政事务局的赞助向政府申请以优惠条件租赁土地。宗教团体可以根据地方法规申请开发或者使用设施。

在管理宗教事务方面政府唯一的直接角色就是以民政事务局局长为首的华人庙宇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委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管香港 600 座寺庙中的 24 座寺庙的管理和后勤运作，向其它慈善机构提供捐款。该委员会向民政事务局提供资金，以财务援助的方式发给需要救助的华人公民。殖民时代的法律没有规定新寺庙需要登记才有资格获得庙宇委员会的资助。

香港行政长官由一个大约 1200 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基本法》规定，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委员会成员来自四个界别，分为 38 个界别分组，分别代表各行各业和社会服务团体。宗教界界别分组由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香港道教联合会、孔教学院和香港佛教联合会组成。这六个团体有权在选举委员会的宗教界界别分组的 60 个席位中分别占据 10 席。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宗教界界别分组人士无须进行选举，而是每个宗教组织以自己的方式挑选代表。六个指定的宗教团体中的每一个也都是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的成员。

政府行为

在这一年，法轮功成员报告，他们一般能公开活动，从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地方仍然被禁止的活动，例如散发材料和举办公开展览。在一个正在进行诉讼案件中，法轮功对于展示标语要经过政府批准的规定提出了异议。8 月，法院推翻了政府没收法轮功标语的决定。法轮功成员说，他们怀疑中国共产党资助了一些私人团体，在公共活动中骚扰法轮功成员。法轮功成员们还报告说，仍然很难租借到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设施召开大型会议和举办文化活动。据法轮功成员称，控制了市内很多场地的香港政府拒绝了法轮功成员租用场所的申请，经常告诉他们这些场地已经全部被预定了。私人场所也拒绝向法轮功出租场地，法轮功成员认为是因为担心受到反法轮功团体的骚扰，他们认为那些团体与中央政府有联系。

法轮功成员在 10 月 1 日举行了一次集会，以提醒人们了解中共在内地镇压法轮功 19 年的事实。法轮功报告，许多当地政治领袖在集会上讲话，支持他们的事业。

民政事务局是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联络机构。

政府高层领导经常参加宗教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在整年内，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代表参加了孔教和佛教的纪念活动、道教节日活动和其它宗教活动。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一些宗教团体表示担忧的是，2 月份生效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对与内地同行的交流和互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媒体报道说，香港基督教会为内地地下教会提供财务支持、《圣经》、上了黑名单的基督教文献、神学培训以及协助建立新教会。但据媒体报道，根据内地的新条例，许多香港牧师暂停或取消了与内地教会的合作，以避免危及那里的人。

宗教团体，其中一些获得政府资助，为所有宗教团体的人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包括福利、老人护理、医院、出版服务、媒体和就业服务、康复中心、青年和社区服务职能以及其他慈善活动。

宗教领袖报告说，他们主持和参加了跨宗教的联合活动。例如，一座当地的清真寺和一座当地的犹太教堂在两个社区的宗教领袖之间保持定期互动。犹太人领袖还举办了公众活动，提请人们记住犹太人大屠杀。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包括总领事在内的总领事馆官员在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代表会晤时强调了宗教自由和各宗教之间对话的重要性。总领事和其他总领事馆官员会见了佛教、天主教、道教、犹太教、穆斯林、基督教和锡克教的领袖和信徒，强调宗教自由和宽容的重要性，并且听取有关香港和内地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

在全年，美国总领事馆官员通过庆祝传统宗教节日，拜访当地道教、孔教和佛教的寺庙观，推动了对宗教传统的尊重。总领事在官邸举行了每年一度的

开斋。总领事馆官员还参加了佛教、孔教和穆斯林社区的其他节庆活动。总领事馆官员还参加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上，总领事馆官员都在公开和私下讲话中强调了宗教自由、宽容和多元化的重要性。

澳门：2018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居民宗教信仰自由、公开传教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以及寻求宗教教育的自由。这个法律还保护宗教集会的权利和宗教组织开办学校、医院、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它社会服务的权利。法律规定，政府不承认官方的宗教，而且明确指出所有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法》规定宗教团体可以发展和维持与澳门以外地区宗教团体的关系。法轮功继续举行集会和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地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

没有关于影响到宗教自由的重大社会行动的报告。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的代表在与宗教领袖和民间团体代表会晤时强调了宗教自由和容忍所有宗教团体的重要性，并且讨论了宗教社区与内地和香港教友关系的议题。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美国政府估计总人口为 60.6 万人（2018 年 7 月估计）。最新的特区年鉴并未提供对佛教徒人数的估计，但表明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个人经常混合佛教，孔教和中国民间宗教。其他消息来源称，大多数人口信奉佛教或中国民间宗教。特区政府新闻局估计，大约有 3 万名罗马天主教徒，其中一半以上是外籍家佣及其他外籍人士；还有 8000 多名基督教徒。基督教教派包括圣公会、浸信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和长老会。也有福音派基督教和独立的地方非教派教会，其中的一些与内地教会有关。各种报告估计穆斯林人口在 5000 到 1 万之间。较小的宗教团体包括巴哈教，估计其成员人数超过 2000 人，以及一小群法轮功成员，估计有 20 至 50 人。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澳门基本法》规定，居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可以限制这些权利。

《基本法》还规定，政府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或者它们与澳门以外的宗教组织的关系。该法律禁止政府限制那些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

根据《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保障特别行政区内的宗教自由，而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

《基本法》表明澳门特区政府不承认官方的宗教，规定所有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法律进一步规定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信仰隐私、宗教集会自由、举行宗教游行的自由、以及宗教教育自由。

宗教团体不需要登记就可以从事宗教活动，但是登记可以使它们能够从这种合法资格中获益。宗教团体向身份证明局登记，要提供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在团体中的职位、身份证号码、联络方式，还要提供团体名称和一份团体章程副本。为了获得免税资格或者其它优惠，宗教团体要向身份证明局提交同样的信息和文件来登记成为慈善机构。

《基本法》保证宗教组织可以举办研讨会、开办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它社会服务。

根据法律，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可以提供宗教教育。公立学校并没有规定要进行宗教教育。

根据法律，宗教组织可以与澳门以外的宗教组织发展和保持关系。澳门的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相联系，承认教皇是教会的领袖。教区主教由梵蒂冈任命。

政府行为

法轮功成员继续在公共场所举行抗议，设置发布信息的场所，没有发生问题。7月，法轮功成员举行一次集会，抗议中共迫害中国内地的法轮功成员，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以纪念已故的法轮功成员。

一些宗教团体报告说，他们通过官方渠道和官方认可的教会，维持了在内地开展慈善活动的的能力。据报道，内地学生无法就读澳门的神学院。

澳门天主教教区继续经营许多教育机构。

政府对建立由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托儿所、诊所、敬老院、康复中心以及职业培训中心提供了财政支持，不论宗教归属如何。政府还继续把人口贩运受害者介绍给宗教组织，以便向其提供支持服务。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没有关于影响到宗教自由的重大社会行动的报告。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包括总领事在内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代表强调了宗教多元化的重要性，并且讨论了宗教社区与内地教友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与民间团体会晤时向与会者提出这些观点，这些人包括澳门天主教主教、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